

『苗栗縣志』史觀之重建與 地方歷史文化觀光資源之發掘*

-以苗栗縣客家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中心-

曾 建 元 (臺灣 中華大學)

- I. 開場白
- II. 何謂白色恐怖
- III.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臺灣共產黨
- IV.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臺灣農民運動
- V. 客家苗栗: 革命最後根據地、解放第一線
- VI. 結語: 白色恐怖的影響

I. 開場白

苗栗縣位臺灣西岸中北部山海交界處, 「苗栗」於原住民族平埔族道卡斯族語中本意為「平原」, 前清德宗光緒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建縣之前, 舊譯貓狸或貓裏。境內丘陵山巒相接, 苗栗市一帶則有平原。苗栗縣為漢人於西岸最後移墾與建縣之地, 境內濱海地帶主要分布福佬族群, 山地主要為泰雅族傳統領域, 接近新竹縣之南庄鄉有賽夏族居其間, 人口最多之族群為客家

* 本文原題「客家族群的白色恐怖經驗 -以苗栗縣為例」, 講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八日上午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假苗栗縣南庄鄉獅頭山勸化堂主辦之『山與海的對話 -苗栗的歷史、族群與人文』第十一屆新臺灣史研習營, 由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學生、學生議會副議長黃中整理初稿。宣讀於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九日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假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主辦之第五屆『地方政府與公共管理 -民主治理與公民參與』研討會『地方觀光與文化休閒產業發展』議題場次, 感謝中華大學休閒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張馨文的評論。

人，則分布於山海之間的衆多丘陵與盆地當中，道卡斯族則已漢化，民族識別已不易。

由於本地客家移民多帶有家族集團與軍事移墾性質，因此民風尚武與團結，在臺灣民主國抗日時期，本地之新苗軍即為臺灣義軍之主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俄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農民運動為東亞運動發展之切點，中國國民革命與臺灣文化啓蒙運動策略則皆受其啓發，遂有農民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苗栗之萌芽，太平洋戰爭前有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共產黨永和山武裝起義之巔峰，戰後則因歷史與地理因素，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在臺灣的最後根據地。

由於中國國民黨的反共意識型態與白色恐怖統治，苗栗客家人的左翼反抗運動，在臺灣和苗栗的歷史記憶和地景中被淡忘而幾近消失。然而隨著臺灣的民主化和兩岸交流的擴大，從人民的立場重新回顧這段過去，給予犧牲者應有的歷史評價，讓他們魂歸故里，永遠活在苗栗人的心中，似乎是時候了。而使苗栗這段幾乎受到遺忘的歷史成為苗栗人乃至於臺灣人共同記憶的更積極的作法，則是將之列入地方官書史冊和轉化為地方文化觀光資源，一方面使之成為地方國民基礎教育的內容，另一方面，則可以其故事性來豐富苗栗地方文化觀光的內涵。然我更有一份期待，希望所有的臺灣人、包括客家人和苗栗人，都能認識這段歷史，頌揚那些為社會和人民而犧牲奮鬥的義行，給那些因而犧牲或受辱的義士與先賢們應有的歷史定位。

II. 何謂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這個名詞怎麼來的，為什麼是「白色」，不是別的顏色？它的淵源有兩個：第一，法國大革命時，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保皇黨的黨徽是白色的百合，波旁王朝殘酷鎮壓當時的革命志士和起義的人民，所以就有了「白色」恐怖的說法，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來源是在俄國，沙皇對於共產黨、列寧(Lenin)的紅色革命，也進行過殘酷的鎮壓，沙皇羅曼諾

夫王朝(House of Romanov)的代表色，也是白色，所以俄國沙皇政府對於共產黨的鎮壓行動，也被稱作白色恐怖。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正在上海發動清黨，動用國民革命軍鎮壓上海工人和共產黨員，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雙方翻臉，國民政府當時就用〈反革命罪條例〉來整肅共產黨，並且由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密查處(後改制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上海、廣州和重慶等都市執行屠殺及人身迫害，所以中共就把法國和俄國的白色恐怖概念，套用在國民黨身上，這個名詞就這樣地留了下來。(侯坤宏，2007)所以我們可以說它的意義，是反革命力量用一切手段對人民的殘酷鎮壓。在我們臺灣來講，就是國民黨政權對於異議者、反抗者的鎮壓行動，雖然早期白色恐怖是指涉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跟共產黨的鬥爭，不過當國民黨政權遷移臺灣後，對於國內共產黨的肅清更務求斬草除根，只是對象還包括一切反國民黨的力量，如自由派和臺灣獨立主義者。不過，從核心的意義來說，白色恐怖則首先是和反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臺灣的白色恐怖，當然跟國民黨跟共產黨的鬥爭歷史有所關連。

III.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臺灣共產黨

1. 共產國際的創立

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鬥爭，國民黨戰敗逃到臺灣來，我們可以想像，很多來臺的大陸軍民當中會有共產黨的潛伏者，但臺灣本地怎麼會有人也參加共產黨？很多人對此不解。

共產主義運動在臺灣的發展，不能視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支系，事實上，臺灣共產黨於一九二八年成立的時候，臺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臺共是以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的名義參加共產第三國際的，而且臺共的目標，還是推翻殖民統治，臺灣獨立建國。太平洋戰爭前夕，臺共遭到日本取締，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奉聯合國命令接收臺灣，在臺灣設

省，收入版圖，中共乃在臺灣設立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招徠吸收前臺共黨員入黨，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自此始匯流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一九一七年俄曆十月，俄羅斯爆發十月革命，由共產黨人列寧(Lenin)領導武裝起義成功，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十月革命鼓舞了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從而也捲起了全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鬥爭風潮，基於協調和指導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以列寧為首的蘇俄布爾什維克黨乃承擔起籌組第三共產國際的重任，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假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了國際共產主義代表大會，通過成立共產國際。五月，中國爆發五四愛國運動，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巴黎和平會議將德國在山東省利權移交日本的規劃，七月和隔年九月，蘇俄發表宣言，宣稱將廢除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此舉加大了中國人民對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好感，從而加速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 36-68)

共產國際的目的是：“以一切手段、武器，為打倒國際資產階級，和建設作為消滅國家的過渡階段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而戰鬥。”“共產國際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可能從資本主義暴政之下解放人類的唯一手段；共產國際還認為只有蘇維埃政府才是歷史賦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在此兩個綱領為基礎，共產國際繼續界定了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的關係：“共產國際認識到，為了廢除資本主義和建設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工人團體，必須有嚴格的集中組織，共產國際又必須真正是世界統一的共產黨，在各個國家從事活動的共產黨，僅是共產國際的支部。”(陳芳明，2009: 54-55)

列寧和共產國際對於東方各國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革命鬥爭十分關心，一九二零年七、八月間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於會中提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主張各國共產黨應當幫助落後國家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且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占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運動，竭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列寧和共產國際看到了落後國家中農民才是為數最多的階級，在這些國家，革命若要成功，就應當要調動農民的革

命性。大會通過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便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並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然而，如果它一開始就由共產主義先鋒隊來領導，革命群眾就將逐漸獲得革命經驗，走上達到最終目的正確道路。”一九二二年一至二月，共產國際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理論，強調吸收農民群眾參與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大意義。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於中國的農民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具有相當大的啓迪作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76-78）

2. 中共在廣東東江壯大

中共建黨初期的農民運動策源地之一，就是廣東省海豐陸豐的客家地區，一九二二年六月，彭湃回到家鄉海豐縣赤山約向貧苦農民宣傳革命，十月成立赤山約農會，一九二三年元旦成立海豐總農會，彭湃當選會長，進而向陸豐、惠陽等地區發展農運，年中雖遭地主勾結地方政府鎮壓，卻在當地客家社會種下共產主義革命的種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95-96）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支援下，於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通過了蘇俄政府代表、國民黨顧問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基本精神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闡釋了三民主義的意義，於民生主義特別提出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之主張，指出“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大會後接著召開國民黨第一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黨部，當中所設立之農業部部長林祖涵，就是共產黨員，而農業部秘書則是彭湃。一九二四年三月，國民黨中執會確定農民運動計劃，決定組織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則通過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和廣州大元帥府，在廣東各地點起農民運動的火燄。七月起，國民黨在彭湃等人的提議下，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115-121）

一九二五年三月，大元帥府東征討伐割據東江地區的陳炯明勢力，四月粵軍許崇智部控制東江， 中共廣東區委員長周恩來以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身份隨軍，命共產黨人楊石魂為特派員，至東江各縣發展工農運動。六月，滇軍楊希閔部、桂軍劉震寰部在廣州叛變，粵軍回師廣州平叛，七月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 成立國民革命軍， 命第一軍軍長蔣中正為東征軍總指揮，討伐九月重新佔有東江的陳炯明，十一月平定東江，周恩來受任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配合地方治理工作，同時推動共產主義運動，這是共產黨第一次掌握地方政府，(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 137-140) 影響深遠，是早期中共力量急速擴張的時期。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展開四一二清黨與七一五分共，以反革命名義指控與論處中共，展開屠殺與鎮壓，東江地區是率先發起武裝反抗的地區，四月十二日，中共在澄海縣和五華縣首先發動農軍起義，四月下旬，中共東江特別委員會成立，由張善銘和楊石魂主持，統一了東江地方共產黨組織的黨務、政治和軍事領導。八月一日中共南昌起義，起義軍撤離南昌後，即取道贛南閩西進入粵東。一九二八年六月，東江特委與潮梅特委合併改組成立新的東江特委，由彭湃出任書記。(林天乙主編，1999： 22-31)

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國民革命運動顯著發展，廣東的臺灣留學生受革命風潮之激勵，則有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策畫臺灣民族革命為宗旨之組織成立，其中以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共產主義傾向最為鮮明，該團反對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路線，主張臺灣殖民地獨立。國民黨清黨分共後，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團員星散，一九二七年八月再為日本政府所取締。團員回臺者因所受共產主義民族革命思想影響深刻，以致成為臺灣共產黨的母體，對臺灣共產主義運動效力尤多。(臺灣總督府，2006： 3-4)

3. 日共支持殖民地完全獨立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二年，當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東方問題綱領〉，規定：“殖民地母國的各國共產黨，必須擔負起殖民地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在組織上、精神上、物質上給予各種支援的任務。”

一九二六年進一步指示，殖民地母國與殖民地的工人運動必須結合起來，同時對於遭受民族與階級雙重壓迫的解放鬥爭，必須給予充分、無條件的支持。(史明，1980: 574; 陳芳明，2009: 58)

日共於一九二三年即遭日本政府取締，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於山形縣再建，並派員七名赴共產國際總部檢討運動方針，共產國際執委會於一九二七年七月通過由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起草之〈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該案由日本共產黨採為黨綱領，在當前政策中依共產國際〈東方問題綱領〉明確主張殖民地的完全獨立，而將朝鮮和臺灣兩殖民地的共產主義領導工作，列為日共的重要使命。

一九二七年底，留學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而受選派至蘇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交換的臺灣青年林木順和謝雪紅完成學業，由共產國際安排代表臺灣無產階級接受日共之指導，於臺灣推展共產主義。林木順和謝雪紅返上海後通過日共駐在員鍋山貞親聯繫上日共，於十二月先後前日本東京，列席日共中央委員會，自渡邊政之輔接受了臺共之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陳芳明，2009: 58; 史明，1980: 575) 以及該委員會常任委員會之決議：“臺灣共產黨佔時以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之名義組黨”，“日本共產黨目前因為選舉鬥爭而忙碌，有關組黨事宜應請求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等，林、謝兩人將指令帶回上海，請臺灣籍中共黨員翁澤生向中共折衝，並由翁澤生引介其所指導之上海臺灣讀書會成員。(臺灣總督府，2006: 9)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對日共進行大逮捕，日共領導人紛紛逃亡，因此實際的指導工作，全落在中共肩上。

謝雪紅在自傳『我的半生記』裡說到她在臺共一大會前同林木順，始經中共聯絡員¹⁾介紹認識了彭榮(謝雪紅，1997: 249) 而根據中共代表彭榮之提議，臺共創黨諸人先行召開臺灣共產主義積極份子大會，為組黨預備會議，四月十五日，始於上海法租界集會，宣告臺灣共產黨成立。彭榮會上發表了訓示性演講，由謝雪紅口譯，說明了中國革命的經驗與問題，而在彭榮的指導下，臺共於發展工人運動外，決定積極參與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農民

1) 可能是翁澤生。

組合，黨綱則明白揭櫫「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臺灣民族獨立」、「建設臺灣共和國」，以及「擁護蘇維埃聯邦」、「擁護中國革命」，由林木順出任書記，日後擔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的蔡孝乾，則缺席當選中央常務委員，並兼任宣傳煽動部長。(臺灣總督府，2006：8-14；許世楷，2006：436-442；謝雪紅，1997：250-251)

這位指導臺共，支持臺灣殖民地民族獨立革命的中共代表彭榮身份，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中有一段記載：“解放後，我即聽到說彭榮同志就是彭湃同志；那是一九五五年國慶節我到天安門紅臺觀禮時，碰到李立三，他告訴我彭榮就是彭湃。當時李在上海，他知道彭湃曾被中央派遣去領導臺灣共產黨的成立大會。一九五六年，我去廣州觀察時，到毛主席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參觀，在那裏，我看到彭湃同志的照片，我認出來他就是當年的彭榮同志。”(謝雪紅，1997：253)有學者論證彭榮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瞿秋白，(何池，2008：28-29)但瞿秋白是謝雪紅上大的老師，是上大社會系教授兼主任，正是他選派謝雪紅和林木順到蘇俄留學的，謝雪紅不可能不熟識他。彭湃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在海陸豐搞蘇維埃政府，這是論者認為他不可能在上海，也不可能是彭榮的原因，但『彭湃年譜』卻顯示他在當年四月的具體行蹤不明，(郭德宏編，2007：416-419)這表示他人可能不在東江，如此說來，他亦可能就是去了上海。

4. 中共支持臺灣殖民地獨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共在江西省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定都瑞金縣，毛澤東出任國家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江西蘇區正主要座落於客家地區。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義上，這是繼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後，再一個基於共產主義理想所建立的國家。中共的建國和世界革命理想，則曾經為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無比的鼓舞力量。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華蘇維埃工農兵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評論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各條款。他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五

條保障：爲全世界革命工作被迫害而居住於中華蘇維埃地區的無論任何民族，均享有受到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庇護及協助民族革命成功與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在蘇維埃地區，現住有不少來自朝鮮、臺灣、安南等地的革命同志。蘇維埃第一屆代表大會時，已有朝鮮代表參加，這第二屆大會增加朝鮮代表畢士狹、臺灣代表蔡孝乾、安南代表洪水、爪哇代表張然和參加，這點表示蘇維埃宣言的正確性。”當時應邀參加大會的臺灣人，還有施至善夫婦、沈乙庚等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華民國發動第五次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戰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撤出江西，一路轉進，號稱長征，蔡孝乾亦從征。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發表〈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八一宣言〉)，呼籲所有反對帝國主義的中、日人民聯合起來，並與被壓迫民族如朝鮮人、臺灣人等聯合爲同盟軍，共同抗暴。十月，紅軍到達陝西甘肅邊區，結束長征，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於瓦窯堡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臺灣和朝鮮等被壓迫民族，以及日本工農份子，在日共領導下，將開始偉大的鬥爭，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建立日本蘇維埃。中國革命與日本革命將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一個共同目標的基礎上結合起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則更改國號爲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史明，1980：1520-1521)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斯諾問毛澤東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中收復所有的失地。毛澤東回答：“中國的當前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不僅僅是保衛我們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三省是必須收復的。但我們並沒有將朝鮮包括在內。不過，在我們恢復了中國失地的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要想掙脫日帝國主義者的桎梏，我們對他們的獨立鬥爭將加以熱情的援助。對於臺灣也是如此。至於內蒙古，那是漢人和蒙古人合居的地方，我們一定要把日本從那裡趕出去，幫助內蒙古建立一個自治的政府。”(Edgar Snow, 1948: 88-89; 2002: 108-109)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了政治報告〈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毛澤東鼓勵「朝

鮮、臺灣等被壓迫的民族」爭取獨立。他呼籲「中、日兩大民族的人民大眾及朝鮮、臺灣等被壓迫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以便打敗日本的侵略戰爭。(史明，1980：1522)毛強調中國的勝利主要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可是還要與「國際上的支援」互相協調配合。談到國際支援，毛明指日本的人民大眾與士兵，以及朝鮮、臺灣等人民。

IV.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臺灣農民運動

臺灣共產黨成立的前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之間，是日治時期臺灣農民運動的高峰，一九二七年則是農運的鼎盛時期，當年臺灣全島有四百三十一件爭議事件，其中有三百四十四件是在臺灣農民組合的指導下進行的，臺灣總督府指出，臺灣農運的一大特徵，就是基於農民的民族或階級的自覺的政治要求較為強烈，而比較少見自然發生的經濟鬥爭。何以日本殖民當局如此看重臺灣農運的政治自覺，臺灣總督府指出，臺灣農運起源於兩端，一為臺灣農業發展大約接近於飽和；另一則是臺灣文化協會民族啓蒙運動的影響。(臺灣總督府，2006a：11-12)

1. 臺灣文化協會的啓蒙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前身為全臺灣青年會，蔣渭水於向林獻堂等人勸募時，深感宜有深孚衆望的民間領袖出面領導，因而游說林獻堂等人共組臺灣文化協會。後經會員選舉，林獻堂出任總理，蔣渭水則為為理事兼幹事。是臺灣的抗日聯合陣線團體。在日本和中國留學的臺灣學生，主要通過文協將共產主義思潮傳入臺灣，在臺北，連溫卿與在中國傳播共產主義的臺灣人彭華英與謝文達互有聯絡。蔣渭水則關切中國革命的發展，當國民黨聯俄容共後，他也對共產主義感到興趣。一九二三年七月，連溫卿與蔣渭水在臺北成立了社會問題研究會，一九二四年五月，連溫卿再通過社會

問題研究會會員山口小靜，在東京認識日共中央委員山川均，(陳君愷，2006: 97) 而對於共產主義有更深的體會。蔣渭水和連溫卿等人，在既有的民族思想之外，對於共產國際關於發展農民運動的主張深表認同，只是對於階級鬥爭的說法有所保留，蔣渭水在所寫〈階級爭鬥與民族運動〉一文中便說：“在帝國主義國內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應取民族運動—以工農階級為基礎的—這是世界解放運動的原則。現在的中國就是採用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王曉波，1997: 76-77)

文協的工作主要是通過各地基層的演講活動，進行臺灣社會的啓蒙，也就因此而對臺灣農民產生了鼓動的作用。

2. 臺灣農民組合的成立

日本在臺灣的統治穩定之後，臺灣被納入日本經濟體系，成為經濟作物的生產基地，當時臺灣農民面臨的問題，就是日本要在臺灣進行大農作面積的開發，為此而鼓勵大地主轉化的大企業主把所有的佃地收回自營，在此同時，日本又決定將被其收歸官有的林野和耕地再放領給大租戶或直接放租給臺灣小農，但是農民則覺得土地的所有權或永佃權受到剝奪，這是臺灣人拓荒開墾出來的，怎麼可以任由日本人和他們的買辦地主這樣強取豪奪呢？所以他們就群起拒絕並起而反抗，包括嘉南大圳最早在蓋的時候，臺灣農民也是出來反抗的，認為日本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臺灣總督府為了留住行政整理時受到免職的日本退休退職官員(退官人員)，以資提高日本人在臺灣比例，乃擬定了原野地預約撥售的辦法。臺灣全島登時掀起反對將臺灣土地放領給退休日本官員(退官人員)的運動，其則主要受到以簡吉和黃石順為首的左傾文協幹部的指導，並與日本農民組合與勞動農民黨建立了聯繫。(臺灣總督府，2006a: 51-52) 簡吉和黃石順在一九二五年領導高雄鳳山郡佃農抗爭新興製糖公司收回耕地改營蔗園之舉，而於十一月成立鳳山農民組合。繼之，為了強化全島農運的合作，在簡吉和趙港等人的提議下，一九二六年二月，各地農組在鳳山召開了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會上無異議通過簡吉和黃石順的提議，當即成立臺灣農民組

合。這是臺灣農民運動的領導組織，由簡吉出任第一屆中央委員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農組在臺中市召開第一次全島大會，宣布馬克思主義化，並通過十七項決議，包括日本勞農黨支持案和促進工農結合案等，前者讚譽勞農黨是日本唯一的無產階級政治鬥爭機構，其鬥爭都是為了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的利益；後者則指出日本資本主義與絕對專制主義勾結，乃正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採取苛烈榨取，臺灣工農皆受其壓迫，因而在反日帝經濟鬥爭中，農組負有與全體無產階級利益息息相關的重大任務，農民運動應做工人運動的後盾。(臺灣總督府，2006a: 48-49, 51-52; 68-69, 78-84)

3. 臺灣共產黨控制臺灣農民組合

臺共成立後，即遷黨回臺，根據黨的方針，積極參與文協和農組，一九二八年十月，身在東京的書記長林木順與黨員陳來旺起草〈農民問題對策〉送回臺灣，〈農民問題對策〉的要旨，就是要將農組完全置於臺共的領導之下，而將臺灣被壓迫民衆的革命鬥爭目標規定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廢除反動地主及其他一切的封建殘餘，十二月三十日農組第二次全島大會後，臺共即順利控制農組。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臺灣總督府以農組宣傳品違反〈治安維持法〉和〈臺灣出版規則〉為由，對全臺農組組織進行大檢舉，農組自此發展受到嚴重破壞。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當局再由被捕的農組幹部趙港循線追查臺共，六月至九月，謝雪紅等人陸續被捕，八月，簡吉組織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協議會，協助受犧牲的農組、文協和臺共同志，十一月，日本當局再伸手臺灣赤色救援會，簡吉本人亦被捕下獄。一九三三年三月，逃亡上海英國租界的翁澤生方被引渡回臺。臺共案件告一段落，(臺灣總督府，2006a: 125-180, 264; 陳君愷，2006: 150-152)農組主要領袖幹部多數被捕，領導中空，農組受此連累，形同瓦解。最終延續到一九三六年。

農組在一九二九年二二大檢舉中受到重創，但是客家人聚居的苗栗卻展現了其在農民運動中的韌性，臺共進一步在一九三一年受到破壞後，苗栗農組大湖支部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宣布集體加入臺共，並且和竹南支部策動

武裝革命，這是臺灣客家人在共產主義和反殖民運動中的光榮戰役。

V. 客家苗栗：革命最後根據地、解放第一線

1. 苗栗地理與人文特性

我是祖籍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新舖鎮的客家人後裔，清朝康熙年間最早從軍征討臺灣朱一貴事變而留下來的族人，主要分布在南部六堆，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起義以後我們移民臺灣的族人，則主要分布在新竹、桃園、苗栗，以前這是同一個行政區，清朝時皆屬淡水廳，而後分成新竹縣和苗栗縣，日本時代再合為一處，叫新竹州，戰後光復初期改制為新竹縣和新竹市，一九五零年八月再分成新竹、桃園、苗栗三縣，一九八二年再劃出新竹市。苗栗縣位於臺灣西岸中北部山海之間，原為平埔族道卡斯族生息繁衍之地，海岸平原為泉州人所開發，其餘漢人移民率皆客家。苗栗縣下曾設三區分管各鄉鎮，北為竹南區，中段為苗栗區，南路則為大湖區。我祖父曾鴻鈞在日本明治時代由今天新竹縣的新埔鎮移居苗栗縣竹南鎮的中港，中港是福佬庄，或說是福佬化的道卡斯族部落，祖母林氏先祖出自漳州漳浦縣，所以我們家族就我們竹南這一支是講福佬話的。



<圖一> 苗栗縣位置圖

在我中學的階段，我好幾次一個人來爬獅頭山，從竹南坐車到南庄鄉登山口，經過勸化堂，翻山越嶺，從新竹縣峨眉鄉下去，再搭新竹客運車到竹東鎮轉搭火車回家。我父親帶我來過，我記得



<圖二> 苗栗縣行政區域圖

他說過，在我中學的那同一個年紀，我祖父曾鴻鈞也帶著他上山過。我父親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時候，曾經逃經獅頭山來，翻山往北埔、峨眉兩鄉交界我祖父投資的番婆坑礦坑而去，後來我也了解到，當時很多客籍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也常逃到這一帶兒來，因為這地方是山區，比較容易退守和藏匿；再者，這裡有西去有中港、後龍公司寮等海港，崎頂、通霄海灘，與海上接應方便；第三，此處山海交界，適合兩棲作戰，竹南更位居臺灣縱貫鐵路山線、海線的分歧點，一旦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苗栗登陸，只要切斷架設中港溪之上的三大鐵橋(山線、海線鐵路、一號縱貫公路)，便可攔腰截斷臺灣南北交通,(黃華昌, 2004: 265) 並且憑藉地勢據守；第四，這裡是臺灣民主國義軍和左翼農民運動抗日的歷史舞台，尤其南庄、三灣、大河底、造橋一帶，丘陵起伏，聚居著硬頸和團結的客家人，尋找庇護人家方便。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臺灣人義不帝秦，宣布獨立建國起義抗戰，臺灣民主國的主要領導人，大總統唐景崧、副總統丘逢甲、大將軍兼第二任大總統劉永福、義軍大統領吳湯興，都是客家人，(薛雲峰, 2008: 42-44)而丘逢甲和吳湯興，則皆都是苗栗縣銅鑼鄉人，吳湯興的民兵部隊號新苗軍，因為組成者都是新竹縣與苗栗縣客家義勇。新苗一帶多為客家人，傳統上尚

武風氣興盛，故擁有較大的抵抗意志。與吳湯興並稱臺灣民主國客家三傑的徐驥、姜紹祖，徐驥為苗栗頭份人，姜紹祖出身新竹縣北埔，實毗鄰苗栗縣，地理相連。新苗軍的行動半徑極廣，北自淡水河畔，南越雲林西螺至嘉義，足見其並非一般鄉勇，只有家族鄉里意識，他們乃以臺灣民主國之國軍自居。新苗軍最後兵敗彰化八卦山，三傑最終皆以身殉國。其中徐驥雖在彰化倖免於難，則遠走六堆，再行舉兵，殉於臺南麻豆。(黃昭堂，2006: 84 -85, 207, 211)

一九一三年，苗栗又有廣東省鎮平縣(今蕉嶺縣)客家人羅福星(東亞、東權)以苗栗為據點，宣稱奉中華民國福建都督孫道仁之命，率十二人來臺，糾合中華民國僑民，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臺灣支部，對外則採用華民聯絡會館名義，設總部於苗栗，又與廣東都督胡漢民相結，由大湖人吳頌賢出面組織共和聯絡會館，而以華民會、共和會為掩護，據點遍及臺北、臺南、彰化、桃園、宜蘭各地，旨在合兩會黨華民與臺民之力，領導臺灣人抗日起義，回歸中國。羅福星本為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華僑，幼隨家族來臺居於苗栗一堡牛欄湖庄即今造橋鄉之豐湖村，稍長居苗栗一堡田寮庄，即今苗栗市福星里，就學於苗栗公學校，越數年即返僑居地。及長加入同盟會，曾投身一九一零年廣州黃花崗之役。其在臺舉事乃深受中國辛亥革命之鼓舞。一九一三年五月，日本探悉後龍地區有革命黨集結之風聲，又偵悉臺南關廟亦有革命黨(陳運棟，2006: 122-123) 九月九日，苗栗大湖支部之黨人葉水傳因偷取當地派出所槍械被查獲，日本警察乃循線進一步追捕吳頌賢，而就葉、吳兩人之口供展開全臺大逮捕，日本當局並為此特設苗栗臨時法院，依〈違反匪徒刑罰令〉對黨人進行審訊，受刑者近千人。羅福星逃亡年餘後於臺北淡水落網，而與各地抗日志士同為被判處死刑者除羅福星外，尚有苗栗人江亮能、黃光樞、傅青風、謝德香、黃員敬等。在此同時，臺中西屯客家人張火爐亦受辛亥革命之感染，而於一九一二年三月與黃炳貴、紀碭二人組織抗日革命黨，在大甲鐵砧山和下罩蘭(今苗栗縣卓蘭鎮)等處獲得同志四十七人，擬在大甲及大湖兩地同時起義，不幸舉事前被檢舉，而為日本當局合併與羅福星案同在苗栗受審。羅福星案、張火爐案與其他抗日案件在苗栗的集體審判，史稱苗栗事件，張火爐事件則單獨稱為大湖事件。(羅福星，1965:

41-44; 王曉波, 1997a: 47-57; 陳運棟, 2010: 122-124; 邱榮裕, 2010)

2. 臺灣農民組合永和大湖蜂起事件

苗栗的共產主義運動，與農組在本地的發展有關，其間的關鍵人物，首推簡吉。簡吉，就是臺灣大眾電腦公司董事長簡明仁的父親，原本是鳳山公學校的教員，帶著小提琴四處搞革命，是一個浪漫的革命戰士。



〈圖三〉一九二九年農組大湖支部人員合影，右四為李木芳。

一九二三年九月，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收購新竹州苗栗郡三叉、銅鑼兩庄四千七百甲地種茶，嚴禁山林盜伐，引起當地民衆不滿，要求保留既有之建築、種菜、獲炭採集和放牧等用途，繼之，一九二五年四月，新竹州大湖郡大湖庄公布放領南湖和馬拉邦地方內的山林和耕地爲大湖庄基本財產，但在此之前，該地亦久爲農民所私墾。六月，庄方決定租賃條件，擅墾者認爲地租過高，條件苛刻，遂起糾紛。十月，農民以何鼎盛爲中心，邀請鳳山

農民組合長簡吉和苗栗街文化協會支部長南苗人郭常和幹部王敏川、謝武烈等人支援，召開農民大會，成立地租拒繳同盟。（臺灣總督府，2006a: 101-103；何來美，2009: 466）一九二七年十月，三井農地爭議之農民邀請農組楊貴（楊達）指導，成立了農組三叉支部，由黃來華任支部長。十二月二十九日，簡吉則指導成立農組大湖支部。大湖支部委員長李木芳，就是作家李喬（李能祺）的父親。後來因為一九二八年六月尊奉共產國際的簡吉等所謂的幹部派，主導農組中央委員會開除了自由派的反幹部派楊貴。（臺灣總督府，2006a: 101-103, 121-123）簡吉指導下的大湖支部，乃成為苗栗的運動主力。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臺灣總督府依〈治安維持法〉和〈臺灣出版規則〉，以非法出版為由，對臺灣全島農民組合，包括大湖支部展開大舉鎮壓，二一二事件過後，一九二九年同一年年底十一月，農組大湖支部進行重建，改選劉雙鼎擔任委員長，劉雙鼎則接受郭常的領導，積極推動業務，並發展出一支秘密部隊，指導部由劉雙鼎、林華梅、陳天麟、劉俊木、吳阿滿五名常務委員組成，郭常指導，將洗水坑、汶水、水尾坪、大湖、南湖、蕃仔林、卓蘭、獅潭等地組員六十三人編成九班。一九三一年五月，大湖郡警察課以劉雙鼎無業為由，要依〈浮浪者取締法〉把他關到臺東開導所去就業勸告、強制勞動，於是他就依農組本部簡吉、湯接枝等人的提議，逃到竹南郡三灣庄的永和山附近的山區來，而改讓林華梅接掌大湖支部。因為簡吉和郭常都曾經到過永和山活動，所以劉雙鼎就把農組的力量擴散到苗栗北部，於六月建立了竹南（永和山）支部，劉雙鼎出任委員長，另組秘密部隊，把組員三十九人編成四班，使農組在苗栗南北得以相互呼應。

一九三一年八月，大湖支部召開委員會，郭常轉達了臺共〈國際青年紀念日鬥爭指令〉，認為中日戰爭一觸即發，因而臺共當作武裝起義之準備；九月，日本在奉天發動九一八事變，旋即全面佔領中國東北，大湖支部認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開始發動，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率軍起而抗敵，二月，郭常赴永和山支部遊說武裝起義，獲得支持，三月一日，日本扶植之滿洲國建國，七日，大湖支部決議解散，各自加入臺共，並且就苗栗武裝起義時各部落的

聯絡負責人進行派任。苗栗農組起義的基本觀點是，臺灣可利用日本與中華民國開戰的時機，爭取臺灣在共產國際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協助下解放。武裝起義則計劃分三路進攻：竹南方面為占領竹南郡役所、錦水及



〈圖四〉『寒夜續曲』劇照

後龍公司寮漁港，襲擊造橋段縱貫鐵路路橋；苗栗方面為占領苗栗郡役所、出礦坑和縱貫線鐵路隧道；大湖方面則為占領大湖郡役所、火藥庫和煽動泰雅族原住民起事。不料事跡自三月十日起，即被大湖郡警察派出所知悉而敗露，日本政府逐步收網，搜索二十一處，逮捕四十餘人，並循線於九月二十二日破獲了竹南支部，逮捕九十二人，逼使劉雙鼎逃亡竹東郡寶山庄新城，但終仍不幸被捕，一九三四年十月瘐死獄中，得年僅二十九歲。其他如郭常和大湖支部部落委員邱天送逐步收網，則亦在獄中被打死。(臺灣總督府，2006：278-296；何來美，2009：466)

李喬的著作『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就是講大湖農民運動的故事，書中就提到劉雙鼎，叫「劉明鼎」，郭常則叫「郭秋陽」，李喬寫劉明鼎的父親劉阿漢，是大湖農組支部的首任委員長。(李喬，2001) 其實是在影射他的父親李木芳。公共電視臺將『荒村』改編成電視劇『寒夜續曲』，有興趣的人可以找出來看。

大家可以遙想八十年前的苗栗，在吳湯興、徐驥後有羅福星，又出了劉雙鼎、林華梅、郭常等一批客家英雄，他們雖然住在山區，卻相當擁有正義感、國際觀和實踐力，腦子裡掛念的是臺灣農民和全體臺灣人民的解放，並且還真的在為戰鬥而做準備。儘管他們失敗了，苗栗人對這塊土地的關懷，

對不公不義的反抗精神，則再一次被看見了。

3. 二二八事變點燃反抗國民黨烽火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廣島、長崎連續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後，日本終於向同盟國請降，經美國代表各國覆文同意後，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頒布〈降伏文書〉，宣告無條件投降，放棄臺灣主權。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聯合國派遣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來臺接收，臺灣光復。但一九四七年二月，全臺即爆發反抗國民政府統治之二二八事變，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的許多臺灣人民，則把臺灣的解放寄望於中共。

中共中央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即任命前臺共黨人蔡孝乾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令其由陝西省延安縣返臺組建中共組織，一九四六年七月，蔡孝乾為到臺灣，正式成立省工委。因人民團體之設立，在臺灣省需經行政長官公署同意，國民政府不欲中共勢力滲透，故而省工委之發展，乃以地下組織的方式。

中共地下黨在苗栗的發展，和簡吉以及二二八有關。簡吉在二二八期間，曾在嘉義參與臺灣民主自治聯軍的起義，臺灣民主自治聯軍由省工委武裝工作部長張志忠領導，簡吉則擔任政治委員，工作相當於現在的政治作戰官輔導長。這支民軍不敵國民革命軍，而於撤退到嘉義雲林山區後解散，簡吉則於不數月即潛回到北部，一九四八年二月，經張志忠之推薦，加入中共，並出任桃園地區工委會書記，受張志忠指揮。(國防部保密局，2008: 18; 楊渡，2009: 253, 257-261) 當時苗栗縣屬於大新竹縣南部地區，桃園縣屬於大新竹縣北部地區，簡吉於日治時代曾經在大新竹縣地區從事農民運動和社會啓蒙。二二八之後，臺灣人對國民黨心存不滿，此乃為簡吉在大新竹縣北部之桃園得以藉其固有聲望發展地下黨組織，並進一步獲得苗栗地區響應的重要社會心理基礎。

二二八期間，苗栗地區則相對平靜。二月二十八日午後，苗栗鎮有律師劉闊才出面組織壯丁團維持治安，並命蘇萬松率隊至後龍公司寮港接收國軍武器，(何來美，2005: 112) 中國石油公司亦組織自衛隊，保護公司員工。三

月一日，有暴民前往苗栗區署警察派出所與大湖區出礦坑中國石油公司探勘處、苗栗糖廠等處攻擊外省人。三月二日，省立新竹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有學生孫欽芳組織學生保護外省籍校長與教師，並拒絕加入民軍。同日，竹南區署遭攻擊，搶奪槍械。三月七日，後龍鄉長蔡咸陽則組織了青年自治同盟會和處理委員會，同日，苗栗車站遭暴民佔領狙擊外省人，治安維持隊長溫思率眾欲將後龍公司寮砲臺國軍繳械，但未成功。（陳興唐主編，1992: 184；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 82-83）八日傍晚，李木芳在大湖區關帝廟勸阻鄉民不要攻擊外省人與政府官員，大湖區所屬大湖、卓蘭、泰安、獅潭四鄉因而未發生衝突事件。（何來美，2005: 113）當地另有鄉人新竹肥料公司職員李建章與王漢國組織治安維持會。（陳建傑，2011: 233）三灣鄉永和山原有民衆欲攻打縱貫線造橋鐵路路橋，則為當地三民主義青年團領袖廖天珠、陳紹英等所阻。（陳紹英，2005: 170）

國軍整編第二十一師登陸南來以後，李木芳被控領導暴動而遭押往桃園一度活埋，劉闊才等仕紳則被疑在苗栗鎮建臺中學私藏軍械、擁武力以自重，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第二處人員逮捕，其人皆為苗栗人新竹縣防衛司令劉定國所救出。（何來美，1997: 360；2005: 114）劉定國並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作證，指係其授意苗栗地方組織保安者，林獻堂亦出面奔走幫忙。（何來美，2009: 475-476）蔡咸陽則仍下獄。大湖區治安維持會日後被懷疑轉化為地下黨外圍組織，相關人員皆受整肅。（李宣鋒主編，1998: 367-369）家父曾群芳則與臺大法學院同學鄭文峰、陳廷裕、林從周等多人加入了地下黨，三灣永和山廖天珠等人則亦加入地下黨，成為苗栗地區的組織主幹。

廖天珠新竹州立中學校畢業，三灣人能在日治時代考上竹中，非常難得。上海一二八事變中國應戰之國軍第十九路軍，係以廣東兵為主力，其中包括軍長蔡廷鍇在內，多為客家人，這一事件鼓舞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也對被殖民的臺灣人產生激勵的作用，廖天珠即為其中一人，特殊的是，他有清楚的客家意識，能清楚地認識第十九路軍的客家組成、客家人對國民革命的貢獻，以及中國政治家中的客家人，他又因接觸孫中山『三民主義』而具有進步思想，他在三灣庄役場和鄉公所服務，在地方上扮演著重要的社會啓蒙和知識青年的領導角色。（陳紹英，2005: 25-26, 141-143）

若說簡吉是臺灣本地農民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影響戰後苗栗客家的代表性人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苗栗的影響，則應當來自於鍾浩東在基隆市發展地下黨的孑遺。

4. 鍾浩東：兩岸客家的節點

在臺灣白色恐怖的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鍾浩東，也就是前臺灣省立基隆中學校長，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他曾經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來到獅頭山，帶著當時兼有地下黨員身份的基中教職員以及轉到義民中學任教的黎明華等人來此登高順便探勘地形。他從峨帽上山，應該也走過勸化堂旁邊的山徑，從南庄龍門口出去，順道到苗栗拜訪了友人。（藍博洲，2003：55-56）

鍾浩東是六堆高雄市美濃區的客家人，是著名的客家文學作者鍾理和的哥哥，他們兄弟在日本時代都去了中國大陸，鍾浩東則是於一九四零年和他的妻子蔣渭水的養女蔣碧玉先到上海，再經香港到廣東省惠陽縣要投身國民革命軍參加抗戰，他們和表弟李南鋒、鍾浩東高雄州立中學校同學、臺北帝國大學醫學系畢業生屏東縣佳冬鄉客家人蕭道應、黃素貞（怡珍）夫婦等人，則皆投入到第七戰區長官部少將參議丘念台在一九三八年組織領導的第七戰區東區服務隊，由此展開的人生傳奇則被苗栗客家作家藍博洲寫成報告劇『幌馬車之歌』，並且被侯孝賢放到電影『好男好女』裡去。因為東江流域當地也是客家聚落，所以這些臺灣青年在當地也結識了很多熱血的廣東客家青年，包括後來經鍾浩東安排到基中任教的黎明華、徐森源、徐新傑等人。

丘念臺是臺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的長子，他們家就在銅鑼鄉，抗日失敗逃回蕉嶺縣文福鄉，從他的字就可以知道他父親對臺灣如何地思念。丘念臺原是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抗戰初期的一九三八年，曾經在客家中共紅軍將領葉劍英的協助下，到陝西延安考察中共的社會組織，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等人的接待，他攜同在延安學習結業的廣東青年十二人，包括中共黨員七人回到廣州，獲得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的支持，並經第

七戰區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之同意，在梅縣成立了廣東民衆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東區服務隊，從事粵東惠州、潮州、梅州所屬二十五縣的民衆工作或游擊工作，以便策應國軍的作戰。東區服務隊在梅縣成立之初，得到中共梅縣中心縣委書記李碧山的支持。丘念臺在蕉嶺文福舉辦民衆抗日自衛組織幹部訓練班，中共梅縣縣委委派古關賢、饒德安前去受訓。該班共訓練了梅州各地學員一百四十人，其日後的發展，一部份人隨丘念臺到潮州汕頭抗日前線，一部份留在梅州進行抗日宣傳，還有一部份則到了惠陽，參與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曾生領導的中共游擊隊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林天乙主編，1999：371-372；藍博洲，2008：58-58；2003e：247-248)

包括丘念臺本人在內，隊員們都受到社會主義理想啓蒙甚深，作風樸實，而一直被視爲共產黨之外圍組織。事實上，東區服務隊裡就有中共的黨支部，負責人爲林啓周(其新)，他也是丘念臺所填詞之〈東區服務隊隊歌〉的作曲者。一九四五年二月，抗戰行將結束之際，惠州失陷，東區服務隊移返梅縣。(卓揚、丘維英、鄧慧，1982；藍博洲，2003e：256)許多隊員目睹了後方黨員幹部奢靡逸樂的生活而求去投靠了東江縱隊，留下來的隊員，思想亦開始左傾。黎明華即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便帶著東區服務隊六名隊員投奔東江縱隊，並於一年後加入了共產黨。臺灣客家人鍾國輝亦在東江縱隊擔任大隊長。一九四四年五月，東區服務隊解散，全部隊員則加入丘念臺主持專事臺僑工作的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粵東工作團。抗戰勝利，始輾轉返回臺灣。(藍博洲，1991：87-88；2003：40-43 58；2003b：255-256)

回到臺灣後，鍾浩東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受任基中校長，因對二二八後國民黨治理下的時局感到失望與不滿，因而傾心於中共，而決志以基中爲基地，發展基隆地區的地下黨支部，而更重要的，就是發行出版地下黨的機關報『光明報』。『光明報』原是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地下黨學生馬克思列寧主義讀書會的油印報，由鍾浩東接過去主辦，在基中和臺北蕭道應等處編輯印製，臺北則主要是通過臺大和臺灣省立成功中學學生地下發行而建立起其組織網絡的。鍾浩東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來獅頭山登高不久後就出事了，導火線之一出在參與『光明報』的臺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畢業生王明德遭到同班同學

賴文泉的家長檢舉，原因是他要追求賴文泉的妹妹，帶著一疊『光明報』去基隆女方家裡炫耀自己的理想和勇氣，但則把女方家長嚇壞了，就到基隆憲兵隊去舉發。他的同夥臺大同學戴傳李在基中任教，戴是蔣碧玉的親弟弟，鍾浩東是他的親姐夫，國防部保密局因而循『光明報』追查到基中，鍾浩東乃於九月被捕。一九五零年十月鍾浩東被押往馬場町刑場就義前，臺北市青島東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的獄中同志們為他合唱他最喜歡的日本歌謠〈幌馬車之歌〉送行。(藍博洲，1991：51-52，89，93-94) 侯孝賢則把這一幕放到『悲情城市』裡去。

5. 省工委的最後一幕

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以後，在臺灣的許多東區服務隊中國大陸或臺灣籍的客家隊員，則隱然以鍾浩東為精神領袖，而以基中為中心輻射出地下黨的組織網絡。

鍾浩東在基中的客家知識菁英網絡，首先向南延伸到桃園縣中壢鎮的義民中學。原來在基中任教的黎明華，經黃素貞介紹，於一九四六年轉到義中任教，他隨即又牽引了基中同事、同樣來自粵東的客家人徐新傑和鍾履霜到義中。當年十一月，鍾浩東介紹了省工委委員陳福星和宣傳部長洪幼樵兄弟與黎明華等認識，黎明華乃恢復了組織關係，並以義中為據點建立了中壢和楊梅兩個地下黨支部，接受張志忠的領導。陳福星原是臺南縣立新豐農業職業學校校長，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因教員林英傑的黨人身份暴露，學校組織關係被破壞，於是逃來北部，先投奔鍾浩東，再到義中躲藏。一九四八年二月，簡吉出任地下黨省工委桃園地區工委會書記，不久調任山地工委會書記，陳福星隨即受命出任桃園區委會改組之新竹地區工委會書記，化名老洪或陳聰敏，領導新竹縣以北所有黨部，亦積極發展苗栗地區之組織，出身銅鑼的新竹縣參議會事組主任曾永賢，擔任新竹工委會委員，為其得力幹部，曾永賢吸收銅鑼公學校同學銅鑼鄉公所職員羅坤春，爾後羅坤春則出任銅鑼鄉支部書記。(藍博洲，2003：48-51；2003c：146-147；2004：8-10；國防部保密局，2008：18) 陳福星與曾永賢又共同吸收苗栗鎮北苗里人陳新錦

入黨，陳新錦則吸收羅春霖、徐富喜等人參加，在苗栗地區活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四月，陳福星透過大園鄉友人林器聰吸收了後者之日本軍中同袍頭份鎮公所兵役科職員頭份流水潭(蘆竹里)人劉雲輝入黨，在苗栗北部發展組織，劉雲輝受命出任新竹地區委員會竹南區支部(工委會)書記，進一步吸收在新竹縣三灣鄉公所擔任會計的親戚孫阿泉出任三灣鄉支部書記，在竹南區內三灣、南庄、大河底、竹南、頭份等地，以謝雪紅在香港組織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為名，發展地下黨之組織。竹南區支部負責區域事實上即包括苗栗縣全境，因其位於大新竹縣之南部，以下則陸續發展出竹南鎮、苗栗鎮和銅鑼鄉三支部，以及新竹武裝工作隊。(王漢威，2011: 23) 竹南區支部幹事會在支部書記劉雲輝之下，有組織幹事孫阿泉、同為三灣鄉公所職員的宣傳幹事廖天珠、武裝幹事江添進以及隔年二月入黨之劉南輝同村連絡張南輝。(藍博洲，2003a: 90-92) 十一月，苗栗鎮支部由李建章、莊榮權、羅坤春等設立。(國家安全局，1991: 100-103; 陳建傑，2011: 115)

一九四九年一月，有新竹縣立田美國民學校教員蕭春進經孫阿泉介紹，於其三灣鄉公所同事宋松財家入黨，適逢二月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宣布實施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四月臺灣省政府頒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規定耕地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之千分三百七十五。省工委乃決定以協助減租政策落實，用以掩護組織之發展。

時張志忠判斷解放軍即將於一年內或稍遲些進軍臺灣，地下黨工作應由迎接解放轉變為配合解放之實際行動，因而竹南區之工作，則積極從事武裝之整備。二月，張南輝吸收大榮煤礦現場員曾文章入黨，曾文章復吸收其竹南公學校同學水果商張增傳與順興鐵工廠工人陳慈雄，於七月發展出竹南小組，由張南輝聯絡指導，受劉南輝領導。張增傳則進一步吸收郭玉崑、吳家祥、吳家田等加入組織，吳家田為臺灣省立新竹工業職業學校學生，曾於夏天計議與竹南小組成員之竹工同學方楹棟、林金成、開南商工職業學校學生吳尊盛搶劫竹南空軍倉庫而未果。十月，曾文章將陳慈雄與郭玉崑、吳家祥、吳家田、林金成等組成民衆工作小組，發展群眾工作。郭玉崑為竹南中港人，曾經受張南輝之指示，籌建中港小組，但以時間匆促，並未如願。

十二月，張增傳一度接受張南輝之指示，準備劫奪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田寮火藥庫。(藍博洲，2003b: 109-110) 張增傳也曾經游說小學同學竹南人黃華昌入黨，黃華昌原為日本飛行少年兵，見張增傳輕信空軍高射砲照測團通訊員徐宣文，認為其願提供炸藥和技術指導，恐怕乃誤中圈套，惹禍上身，未予承諾。(黃華昌，2004: 264-267) 竹南區支部對於竹南中港溪橋至造橋崎頂一帶沿途軍用電話線及橋樑隧道情形調查詳盡，一旦解放軍由本地登陸，即可接應。竹南小組之曾文章、張增傳、陳慈雄等，皆受劉雲輝之領導，並由張南輝連絡指導，協助劉雲輝在大竹南區各山村建立武裝基地。竹南區支部藏儲武器及掩護逃亡之處所，則為造橋鄉大溪底及大湖、苗栗、三灣三鄉鎮交界處之紙湖村附近山區。(藍博洲，2004: 13; 國家安全局，1998: 178-183)

竹南區支部除了在竹南發展小組有所斬獲外，在鄰近地區亦有所突破。五月，南埔國校校長游金龍吸收之同校教員徐鼎房、新竹縣立大河國校教員黃昌祥等人，與蕭春進成立田埔小組。(曾培強，2010: 74-75) 六月二十一日，總統蔣中正公布〈懲治叛亂條例〉，此後被捕黨人的命運，則是面臨無比嚴苛的刑殺。八月，來臺擔任省立新竹商業學校校長的林啓周身份暴露，東區服務隊的同志關係，成為國民黨政府追查的對象，基隆『光明報』事件爆發，導致基中被查抄、逮人，黎明華緊急自義中撤退，由陳福星安排至三灣內灣村孫阿泉家中匿居，化名阿春或小劉，在竹南協助組織農民運動。(藍博洲，2004: 13) 當月另又有中國石油公司苗栗探勘處員工謝裕發組織工友同樂會，逐步發展組織，參與者有劉雨雲、徐富喜、吳添德、羅松春、李永城、徐錦春、黃寅亮、李元淵、陳嚴川、陳鑑淇等人。(藍博洲，2003b: 123-124; 陳建傑，2011: 242) 大河國校教員黃逢開則經廖天珠介紹入黨，與彭南華、江添進等人為一小組，隸屬於銅鑼支部。(曾培強，2010: 75) 十月，竹南鎮支部於三灣成立小組，第一小組櫻第一組由孫阿泉領導，聯絡有三灣鄉農會總務股長陳紹英、新竹縣參議員徐龍耀和三灣鄉人廖錦榮；三灣第二小組櫻第二組則由三灣鄉公所總務課職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彭南華負責，(藍博洲，2003a: 90-92) 廖天珠吸收農民廖阿賜。(曾培強，2010: 76) 黃逢開吸收劉清玉、劉榮錦、張阿才、許木生、溫水龍等人參加組織，(中央研

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0a) 南庄鄉公所職員張義珍由胡錦華介紹入黨, 接受黎明華領導, 隸屬於南庄支部,(林必修, 2012: 14) 蕭春進另發展出南庄鄉公所文化股主任古滿興、鍾錦英及黃榮春, 徐鼎房發展出溫德明, 宋松財發展出黃龍勝, 而彭南華也在頭屋鄉、獅潭鄉一帶發展出黃元盛、黃元雙、曾榮進、張德有, 負責武裝工作的江添進亦發展出王清金、黃天貴、張振文、黃文和、羅慶增、黃榮貴、劉雙長、江清貴, 王清金以下再發展出: 馮開興(李阿春、李阿發、劉辛興、范永昌、張油、黃阿均、黃天富、張桂霖、黃坤戊、徐連業、溫機成); 黃阿田(張金對、張金增、林淼榮、黃清漢、羅賢文); 彭金石(彭玉海、彭輝石、劉清海、邱榮昌、李錦榮、黃金發、李雲明、鍾雙發)。(曾培強, 2010: 76-77) 十月底, 孫阿泉、彭南華、廖天珠等人因參與地下黨身份暴露而棄職逃亡,(曾建元, 2010) 十一月, 宋松財發展出黃順錦,(曾培強, 2010: 75) 獅潭人頭屋雲洞宮乩生曾榮進為組織農民團, 而與南庄蓬萊村佃農范阿全、彭化興、彭化祿、彭木全、彭柑耀等人接觸,(陳滢, 2012: 7) 謝裕發邀集徐鑾枝、謝富榮、彭新貴、徐永紹組織讀書會, 研讀『論青年修養』、『解放後的工商業』、『今天的世界』、『工業概要』等書, 中國石油公司苗栗探勘處支部成形, 一度發起工人增薪運動。(陳建傑, 2011: 242-243) 十二月, 黃昌祥引介南庄鄉員林村農民黃新玉入黨, 廖阿賜則吸收田阿海成立永和山小組, 隔年正月, 廖阿賜再吸收廖天金、張阿煥、張紫和、黃裕蘭、傅阿全等成立頭份小組, 由廖阿賜任小組長。(曾培強, 2010: 76) 獅潭鄉公所事務員林彩滿則經曾榮進介紹入黨, 與楊先進、陳雙喜編為一小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0b) 而中油苗栗探勘處支部之謝裕發、徐鑾枝、徐永紹、劉雨雲等人又分別聯絡錦水礦廠和出礦坑礦廠廠工李雲明、黃鑫發、吳日麟、吳紹光、吳思源、邱河生、陳燕金等人, 並論及解放軍攻臺之際進行護廠事宜。(陳建傑, 2011: 242-243)

至一九四九年底, 竹南區支部在三灣之外, 在竹南、頭份、南庄(徐承立、玉光照相館店主李旺秀等)、田埔、大河底(大河國校教員黃順欽、黃逢開等)、頭屋、獅潭、永和山、苗栗等地成立各小組, 武裝工作之組織亦初具規模。

由於苗栗組織發展迅速，張志忠乃化名老吳，親自於十二月在大河底神桌山劉鼎昌之山寨主持為期一週之竹南地區幹部學習班，參加者計有大河底之彭南華、黃逢開、廖天珠；三灣之江添進、孫阿泉、曾興成；頭份劉雲輝、張南輝；南庄李旺秀；銅鑼曾永賢（長脚仔）、宋松財以及外鄉之陳福星和原義中教員黎明華、徐邁東、鍾蔚璋等十六人，研習〈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把革命進行到底〉、〈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學習文件。（藍博洲，2004：21-22；國家安全局，1991a：152-155）

張志忠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臺北市衡陽路住處被捕，但亦適時指示陳福星整頓新竹縣大湖區以北各地山區黨組織，開展地下武裝活動，建立游擊地。一九五零年一月，蔡孝乾繼而在臺北市泉州街被捕，一月三十一日，蔡孝乾等出面勸降，國防部保密局依蔡孝乾之線報，接連逮捕省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洪幼樵等省工委領導。（曾永賢，2009：98）省工委領導接連出事，但山林鄉野裡苗栗的黨人們仍然戰志昂揚。

一九五零年一月間，黎明華吸收新竹縣立蓬萊國校教員張燕梅入黨，於二、三月命其接受張義珍之領導，三月，張燕梅吸收蓬萊國校教員同事日進春加入組織。（林必修，2012：14）春天，新竹縣立五湖國校教員徐金生經劉辛祥介紹入黨，先後吸收廖明輝、邱淑景、林朝源等參加組織，並將部分成員轉介予苗栗地區核心幹部銅鑼鄉人前臺大機械工程學系學生羅吉月，逐漸發展出西湖鄉之九份支部與泰安鄉之興隆山支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c）獅潭之林彩滿則召集公所職員黃裕煥及鄉人甘永煥、沈阿鼎、謝運石等人在獅潭鄉義民廟討論三七五減租之宣傳問題。（謝孟達，2012：49）二、三月間王清金亦發展出徐運發、范阿立、李禮盛、劉新盛、張阿德、廖阿立、黃文豐，古滿興發展出徐硯田與羅紹清。（曾培強，2010：75，77-78）惟宋松財仍發展出黃河滿與張阿鼎，後二者則接受黃新玉之領導。（曾培強，2010：75）

一九五零年三月一日起，保安司令部經過十個月的內線培養與準備，在竹南、頭份、三灣、南庄一帶展開大逮捕，竹南小組首遭反問，國軍官兵葉烏及王平二員託稱捲款潛逃，經徐宣文介紹，擬請曾文章帶到山區基地藏匿，

保安司令部乃於曾文章宅設網，一舉逮捕張增傳、曾文章、方家祥、郭玉崑等人，竹南小組瓦解。(國家安全局，1998: 180; 陳建傑，2011: 114) 張南輝表兄黃蘭芳被捕審訊時因不斷據理力爭得罪審判官，則遭牽連，被控從事地下黨宣傳工作並於上年七月派赴香港聯絡。(陳運棟，2006: 475-476) 張南輝機警躲過逮捕，其妻陳粉妹、鄰人林萬來和表兄黎阿展等則被捕。(藍博洲，2003b: 110) 曾文章等〈竹南案〉於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宣判，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曾文章、張增傳、黃蘭芳三人同遭槍決，埋骨於臺北六張犁。而自三月起，竹南、三灣等地之徐木生、湯天忠、黃元雙、曾榮進、張德有、王清金、黃榮貴、劉雙長、羅慶增、江清貴、廖宏業、劉清泓、劉榮香、劉榮錦、黃逢銀、廖紹崇、黃逢財、張阿財、陳紹英等人則陸續被捕下獄。(藍博洲，2004: 25; 2004a: 71-72; 曾建元，2010) 曾榮進所供出之農民團范阿全等人亦同一命運。(陳滢，2012: 7)

黎明華、劉雲輝等省工委領導，乃在曾永賢的安排下，再逃往銅羅，由謝發樹、謝其淡叔姪接應，並擬伺機恢復竹南地區之組織。五月，黎明華在頭屋鄉天花湖以收聽之新華通訊社廣播為內容，主編並油印出版地下黨機關報『簡明新聞』共四期。陳福星之北部黨組織則接到蔡孝乾自新前發出之〈一九五零年四月指示〉，鑑於國民黨黨國整肅徹底，形勢惡化，要求「退守保幹」，即建立基地保持幹部，暫時不積極活躍，一切以保存實力為原則。陳福星偽稱〈四月指示〉為中共中央所發，召集全省幹部，以陳福星為首，與前『臺灣公論報』會計室課員黃培奕、前新竹縣蘆竹鄉長林元枝、前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等在臺北縣、桃園縣交界之烏塗窟基地建立臨時領導機構以重振旗鼓。(許進發，2008: 14-15; 藍博洲，2003: 58-72, 2003d: 184-185) 六月，蕭道應等由新竹縣苑裡鎮友人石聰金安排，由烏塗窟轉移至新竹縣苑裡鎮、後龍鎮各地，協助林元枝開關中部地區工作。(藍博洲，2003e: 300-302) 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十一月，張義珍自首。(林必修，2012: 14)十二月，重整省工委發出〈一九五零年工作總結〉。三灣大河底之黃逢開逃抵大湖，再進入獅潭鄉七古林。(陳映真，2001: 250)

一九五一年二月，省工委在苗栗重整，由陳福星正式接任書記，曾永賢負責組織與統一戰線，並任苗栗縣臨時工委會負責人，黎明華負責軍事、文化

教育和群眾運動，黎明華撰寫〈向偏向作鬥爭〉，針對周慎源在桃園不服領導的教訓進行內部整風。(藍博洲，2003: 73) 月中農曆大年初一，李建章於苗栗被保密局逮捕，刑求逼供，後於九月遭處決，家人看了公告始在醫院解剖室內找到屍體，其女友弟弟亦遭槍決，判決書至今無著。(國家安全局，1991: 100-103; 何來美，1997: 15-17) 同案被難者幾乎都是保密局為立功而自李建章親友中羅織者，有詹俊英、吳庭彰、中學生廖英輝、陳權興、王漢國、曾雲城、以及吳瑞炯、吳揚水、林玉香、吳秀霞、羅士光、賴煥東六名國校教員、和銅鑼鄉公所建設課職員邱熒燈、臺中縣大安鄉公所幹事郭煥章、(邱榮學、謝欣如，2007: 17) 苗栗、大湖一帶受難者無數，人人自危。(陳建傑，2011: 241) 與謝裕發共同在新竹縣發展出中油竹東油礦廠支部的陳新錦，為躲避警方查緝，則逃亡至頭份尖山一帶，改編入謝裕發在當地領導之支部互助組，從事情報工作。(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四月，黃逢開奉命至獅潭鄉鹽水坑另行開關據點。(陳映真，2001: 251)

六月一日，臺灣省情報委員會召集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臺灣省調查處，針對重整省工委成立特種聯合小組，全面進行肅清，省工委桃園、新竹各地組織先被破，苗栗成為最後根據地。當月，南埔小組蕭春進被破，七月，重整省工委劉興炎和黎明華在桃園縣龍潭鄉梁姓群眾家中被捕投降，特種聯合小組依其建議，誘捕熟悉苗栗地方關係之客家同志范新戊，使之成為內應。范新戊為黃素貞任教於臺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學時之同事。八月，蕭道應與黃素貞自屏東逃來苗栗。重整省工委組織自桃園、新竹全面撤退，全部集中於苗栗，永和山與頭份小組廖阿賜不幸於此時再遭破。九月十七日，國防部公布〈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和〈檢舉匪諜獎勵辦法〉，限期十一月二十日，呼籲黨人投誠。十月，三灣之彭南華、宋松財等率眾投誠。(藍博洲，2004: 31-32; 曾培強，2010: 75-76) 十月二十八日，陳雙喜自首，供出組織關係，林彩滿遭循線逮捕，於一九五二年四月槍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b) 十二月，張燕梅自首，供出張義珍隱匿組織、自首不誠情事。(林必修，2012: 14)

黎明華和劉興炎的反正，是猶做困獸之鬥的重整省工委形勢急轉直下的關鍵。十一月二十五日，黎明華以省工委兼中部負責人身份，與彭欽嗣、黃

樹滋、郭維芳、廖學信、林希鵬、王顯明、劉興炎、王子英等九人聯名公開向陳福星勸降，而由其誘捕的范新戊，則成爲臥底線人，經過一番布局，終於於年底與重整省工委恢復聯繫。

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黎明華、劉興炎、林希鵬等地下黨領導和彭欽嗣、黃樹滋、郭維芳、廖學信、王顯明、王子英，共同發表宣言脫離中共自新，二月，特種聯合小組在苗栗縣東西部展開逮捕行動，規劃將省工委逼入苗栗縣西南高地加以圍困。(藍博洲，2003：73-77) 羅坤春領導銅羅支部之黃逢開和徐慶蘭在獅潭鄉七古林張秀錦香蕉園雙雙被捕。(陳映真，2001：255) 彭新貴、徐鑾枝、徐永紹、謝富榮向苗栗憲兵隊自首，中油人事遭循線整肅。(陳建傑，2011：242-244) 重整省工委勢力被逼入三義鄉。三月，蕭春進、黃昌祥、徐鼎房、黃新玉等遭保安司令部處決。(許哲韋，2012：11) 張南輝原依陳福星指示，在銅羅、三義一帶經營組織，經由謝發樹、謝其淡等關係，終於在三義農民羅盛鼎、羅盛昌土地上，建立了魚籐坪基地，羅盛鼎岳父謝雲開，曾是臺灣農民組合三叉支部成員，支持革命事業，即其引介張南輝予羅盛鼎。四月，陳福星將蕭道應、黃素貞交予范新戊安頓，並指示重整省工委二十六日於魚籐坪基地舉行工作會報，聯合特種小組則由內政部調查局第五處處長廣東省梅縣客家人郭乾輝負責指揮，利用范新戊佈線，在魚籐坪展開誘捕，蕭道應、曾永賢和陳福星果然一落網。張南輝則被誘往臺中逮捕。(藍博洲，2003b：126-129；2003d：186-187；2003e：303-319；陳建傑，2011：115-116) 九份與興隆山支部遭落網之核心幹部供出，苗栗縣三義鄉民代表會書記張文彩和徐金生、黃財旺、吳慶薰、廖明輝、曾子用、謝錦盛、曾和六、吳長財、魏坤貴、林朝源、邱淑景、劉家東、林希仁等苗栗黨員於五月被捕，張文彩、徐金生等遭處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c；陳運棟，2006：476；邱榮舉、謝欣如，2007：18) 八月，廖天珠向調查局苗栗站投誠，黃逢開魂斷臺北馬場町。(藍博洲，2004：33) 張義珍與張燕梅亦遭槍決。(林必修，2012：14)

劉雲輝繼曾永賢接任苗栗縣臨時縣工委會負責人，將殘餘的黨人重組爲三個互助組，而分別由孫阿泉、謝裕發、江添進領導，在竹南區之造橋、頭屋、公館、獅潭、銅羅、三灣等鄉及頭份鎮丘陵山區峽谷崖坑中活動，劉

南輝最後與孫阿泉、徐邁東在獅潭鶴婆山徐姓群眾家遭圍捕而分手，徐邁東當場遭擊斃。江添進藏匿三灣大坪村家中，發展出父親江應發與鄰近農民組成之農民團，在山區為警方擊斃，父親江應發等十二人隨後被捕，而臺盟苗栗武裝組織成員李阿春、王清金等，以及王清金發展出的徐運發等人，則繼而於十二月被捕。(國家安全局，1991b: 386-387; 藍博洲，2003a: 92-97; 曾培強，2010: 76-77; 陳運棟，2006: 476)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調查局安排蔡孝乾、洪幼樵、陳福星、曾永賢、黎明華、蕭道應、黃素貞、林元枝、葉榮富、翁廷俊、曾金火等十五人在臺北市裝甲兵軍官俱樂部召開自新記者會，並向劉雲輝招安。一九五三年元月，調查局會同保安司令部動員自首自新之陳福星、曾永賢、劉興炎等二十人，組成肅殘工作隊，部署策動劉雲輝投降。(藍博洲，2003a: 104) 曾經收容林元枝、曾永賢於住處的通霄鎮長邱乾耀遭供出而終於被捕，以連續藏匿匪徒於一月三十日遭處決。(何來美，2012) 三月中旬，孫阿泉父親在頭屋鄉說服孫阿泉與自新竹南逃的地下黨新竹鐵路支部機務段小組成員鍾二郎投誠，肅殘工作隊再命陳福星、曾永賢、孫阿泉與鍾二郎向劉雲輝勸降，經孫阿泉之聯繫，劉雲輝在頭屋鄉扒子崗投降，並再由劉雲輝帶至頭屋東三湖向下屬謝裕發、羅吉月勸降。(藍博洲，2003a: 98, 104-105) 省工委組織至此終結。謝裕發領導互助組之陳新錦不知組織瓦解事，仍攜帶手榴彈繼續逃亡，不久被捕。入冬之後，謝裕發、劉雲輝、陳福星、蕭道應在銅鑼勸降謝其淡與鍾蔚璋。(藍博洲，2003d: 199-200) 十二月，石聰金在臺中縣大安鄉被捕。二十八日，國防部核准陳福星、曾永賢、劉興炎、林希鵬、黎明華、蕭道應等六人自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李阿春與同案張金對、彭金石、李阿發等同遭處決。(國家安全局，1991b: 387-388; 藍博洲，2003e: 329-330; 陳建傑，2011: 120)

6. 苗栗的左翼客家知識青年

苗栗為一農業縣份，境內山地、丘陵交錯，可耕地有限，交通不便，工商業發展滯後，日本時代與臺灣光復之初，國家關於高等教育的投資嚴重不

足，因而境內並沒有高級中等和高等教育機構，也正因沒有中上學校，不僅中上學歷者有限，在地學生運動的環境與條件也不存在。如果以客家的人際與地緣動員脈絡來界定客家運動的客家性格，則苗栗本地並未發生左翼的學生運動，這也使得苗栗歷史上的所有客家反抗運動均呈現著一個一致的現象，即其參與者大多數係出身自農民階級，是標準的農民運動，國際共產主義對於農民運動的發展策略，基本上是適應於苗栗地方革命的需要的。但客家知識份子苗栗左翼運動中亦並未缺席。曾永賢的二兄曾永安畢業自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在日本留學期間與廣東臺灣青年團團員、臺灣農民組合委員長、中共黨員桃園客家人楊春松往來密切，與銅鑼留日青年李鐵夫、邱紹棠等俱為臺灣留學生界的左翼活動家，一九五零年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定居。曾永賢赴日留學即受曾永安之照應，亦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政治學系，生活與思想皆深受曾永安之影響。一九四六年，曾永賢加入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在早大成立社團社會科學研究會。當年五月返國，在銅鑼舉辦國語講習會，從事共產主義之社會啓蒙。二二八事變期間，投入謝雪紅於臺中領導之二七部隊。事平後加入中共地下黨，受洪幼樵之領導。一九四七年六月曾永賢至桃園新竹縣參議會任職，組織關係改由負責北部黨組的張志忠領導，不久張志忠則指示改由陳福星領導，一九四八年春天，陳福星接手北部黨務，曾永賢因而隨之躍上了日後重整省工委的歷史舞臺，成了最後的地下黨人。(曾永賢，2009: 24-97)

曾永賢具思考力與實踐力，為重整省工委的重要支柱，苗栗的組織網絡無一不與他有關，在向國民黨政府自新後，對共產主義問題痛下反省與檢討，加以中國大陸政治風雲詭譎，兩岸關係蛻變，中共亦非比當年，在臺灣民主化後，經李登輝總統延攬為總統府參議，而利用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流亡的臺灣前輩中擁有的豐富人脈和極高聲望，對於促進兩岸和平、維護臺灣自由民主的貢獻極大。雖然面對共產主義的立場有所改變，但對於自由、平等與民主的信念和堅持，由年少到白髮，則是始終如一。

另一位出現在政府檔案中的苗栗客家左翼知識青年，則是臺灣本地臺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培養的家父曾群芳。二二八時，我父親還是臺大學生，他和王明德、戴傳李、賴文泉是同班同學，當時曾經和同學林從周參加臺灣

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學生組成的治安維持隊忠義服務隊，也參與了臺北學生軍的起義，無疑地是一個熱血青年。

我父親當時在地方小有名氣，因為在日治時代讀完公學校能夠繼續升學的算是少數，我父親畢業自竹南公學校，一般而言全校只有兩個名額可以考得上新竹州立中學校，但我父親則應屆考取，而後因太平洋戰爭緣故，跳級考大專，又考上了臺灣總督府立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本科，該校在光復後改制併入臺大法學院，由此看來，父親在竹南中港庄頭算是很會讀書的。日本投降後他曾回到竹南組織臺灣學生聯盟竹南分會，這是臺大醫學系學生郭琇琮在臺北發起成立的全島性學生組織，在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到國民政府十月二十五日受降期間，協助臺灣社會的穩定並鼓勵臺灣學生學習中國文化，我父親既然號召同鄉學生參與，所以當然在故鄉年輕一輩有一定的名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期間，我父親曾在臺北參與了學生軍第一大隊的起義，(曾建元，2010a: 147-149) 一九四八年三月臺大畢業，與同學陳廷裕等人考進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處工作，當時臺糖總經理即為光復時官居經濟部臺灣區特派員辦公處專門委員兼糖業組長主持臺糖接收的沈鎮南。六月底家父與臺大同學王清池在月初先行入黨的同學鄭文峰介紹下加入地下黨，隸屬學生工作委員會臺大法學院支部，並與同學林從周共同接受鄭文峰之領導，(曾建元，2008a) 不久轉任臺北市工作委員會產業支部委員，接受市工委書記郭琇琮和產業支部書記高懷國之指揮，參與『光明報』之編務與投遞，聽父親說，他這一系統的『光明報』是任職華南商業銀行的高懷國主持的，主要是鈔錄來自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新聞報導，油印好後，則針對特定目標去發送。他亦奉命協助鄭文峰調查臺灣各地糖廠資料，目的在臺灣解放時保護糖廠，以維持其正常運作。曾群芳的組織關係雖然原先主要在臺北同學圈或工作圈，如學委或產業支部，(曾建元，2008) 但他也在家鄉竹南拉了一些鄰居、小學同學入黨，像是竹南公學校的同學省立竹南中學教師顏松樹就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劉雲輝主持的竹南區支部成立，時曾群芳尚未入黨，其後亦不屬於該一系統。一九四九年七月，曾文章為首的竹南小組成立，曾文章與其小組成員亦多為曾群芳竹南公學校之同學，但曾群芳亦不屬於該系統。一九四九年九月，曾群芳在新竹市立新竹中學聖廟(原址

於成功里林森路，一九五七年拆遷至中山公園現址。新竹市立新竹中學亦遷校虎頭山下，即今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內為臺大同學陳廷裕介紹之邱仁榮入黨擔任監誓，而後邱仁榮再吸收楊清木入黨。一九五零年一月，蔡孝乾在臺北市第一次被捕，省工委學委楊廷椅下令停止組織活動，但邱仁榮仍於四月十六日再邀翁木入黨。翁木亦為家父竹南公學校同學，家父不忍拒絕，乃於九月在新竹市省立新竹師範學校附近山上由陳廷裕監誓，為其完成入黨儀式。邱、楊、翁等俱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職員，(國家安全局，1961: 8-11)也都是陳廷裕新竹州立新竹商業學校同學。

一九五零年大年初五，家父竹南公學校同學黃華昌經其遊說、顏松樹之介紹，由家父監誓，在新竹縣立竹南國校附近的小山崗宣誓入黨，家父將黃華昌介紹予省立師院英語專修科學生陳水木，再由陳水木轉交楊廷椅領導。陳水木和楊廷椅皆為省工委臺北市工作委員會委員。黃華昌曾到日本大津陸軍少年飛行兵學校學習，具有駕駛戰鬥機的能力，原期待地下黨能安排他到東北小延安松江省佳木斯市投入解放軍空軍。(黃華昌，1950: 42; 2004: 268-271)三月曾文章竹南小組被破，四月，蔡孝乾在嘉義縣竹崎鄉第二度被捕，決定自新，政府依其供詞對省工委展開五月大逮捕，黃華昌因被落網的陳水木和楊廷椅供出，列入〈學委案〉被告，而自此身陷囹圄。(黃華昌，2004: 285-293)五月大逮捕的餘波盪漾不已，六月沈鎮南與臺糖多位高層人員被誣涉嫌叛亂被捕。(程玉鳳，2002: 2)曾群芳為避開臺北的政治風暴，乃自行請調於七月遠赴後山花蓮縣光復鄉至甫由臺糖公司收回直營的花蓮港糖廠會計科服務，此舉令長兄曾培芳不解而抱怨不已，但他自己心裡有數。約莫工作夏天兩個月，沒事就在甘蔗田裡獵環頸雉(啼雞)，九月某日晚間，陳廷裕自臺北東來出現於糖廠日式木構造員工宿舍(西宿舍)，告知聽聞政府已發布通緝令，兩人乃當下決定共同逃亡，遂棄置一切衣物包括一套西裝予室友江子名，啤酒尚未飲盡、燈泡亦未關上，便匆忙趕往光復市區向竹南同鄉昔日竹中同學陳克恭借款新臺幣五十元作為盤纏，旋即連夜離去，與陳廷裕兩人從花蓮、臺東、高雄、臺南、竹南、新竹至臺北、社子，途經家中刻意燒燬所有書籍、照片與文件，復攜顏松樹藏匿木柵、竹東各地，翻越過獅頭山，一度藏身番婆坑，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七日，國防部總政治部宣

布補正〈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及〈檢舉匪諜獎勵辦法〉，限地下黨人於十一月二十日前自首，經擔任臺灣省政府農林廳長徐慶鐘祕書的長兄曾培芳找到軍職轉任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科長章和樂疏通，得其協助安排投案，到調查局臺北站站長林頂立家中寫自白書，共寫了四次，才同顏松樹、陳廷裕共同向保密局投案，僥倖得以免訴，但實並未完全交代組織關係。

一九五三年三月劉雲輝苗栗縣組織瓦解。八月，翁木因媒說合，將與劉菊妹結婚，惟恐婚後組織關係遺害妻室，乃於一九五四年二月語告邱仁榮與楊清木，表示自首意願，為邱、楊兩人所阻，但邱、楊意志亦因之而動搖，以自首事詢曾群芳與陳廷裕，皆為所阻。七月二十七日，翁木在苗栗縣議會前副議長王天賜陪同下向憲兵司令部投案，供出組織關係，邱、楊兩人於八月被傳到案後認罪，二十七日，曾群芳和陳廷裕邀約邱、楊兩人在臺北萬國旅社見面，詢問彼等被傳及審訊情形，知自首不誠事發，乃再向保安司令部補交組織關係（國家安全局，1961：8-9）並由曾培芳再次出面商請臺大老師司法院大法官蔡章麟引薦之前國防部軍法局副局長洪福增律師協助奔走，僅羈押國防部軍法處看守所月餘，便得脫險身免。國家安全局所編的『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三輯，指我父親是地下黨省工委新竹地委竹南支部委員，（國家安全局，1961：8）我就這件事和我父親談過，他說特務搞錯了，他根本沒和竹南支部有何瓜葛，萬惡歸焉，純粹受盛名之累，因為竹南人被抓進去受到刑求逼供，而一定要咬出人來時，這個遠在外地的臺大畢業生，就最容易被認為是與事者，反正人也不在竹南，把事情推給他，可免許多麻煩，結果我父親變成竹南地區的重要領導幹部，但他在地方上其實只由陳廷裕再發展出新竹的組織關係，因陳廷裕是新竹人，畢業於竹商，曾群芳畢業於新竹州立中學校，與新竹亦有密切的地緣關係，不過嚴格說來，他的活動都與苗栗、竹南、中港各級地下黨組織沒有直接關係。

再來要談的是林希鵬，他的形象爭議很大。林希鵬是苗栗客家人，新竹州立中學校畢業，考上省立師院數學系，與周慎源同班，後共同投入師院學生自治會，擔任理事職務，在校期間和教育學系學生顏松樹、黃玉坤、和臺大地質學系學生葉雪淳等過從甚往。（黃玉坤口述，2006）林在竹中高家父一屆，顏松樹和葉雪淳則皆為竹南之福佬人，是家父竹南公學校的同學。林希鵬在

校期間領導一小組而受同校理化學系學生陳金目之領導，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臺灣省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調軍派兵整頓臺大與師院，是為四六事件，林希鵬因身分暴露而逃亡，經張志忠指示前赴新竹桃園協助簡吉新竹地委之組織發展，後由陳福星接手新竹地區工委會，林乃出任新竹海岸地區支部書記，化名老李，與新竹農田水利協會水利員范光福在新竹桃園組織新農會，以作接應解放軍登陸後軍糧之準備，發展之組織地緣關係包括今桃園縣觀音鄉、新竹縣新豐鄉青埔村等地。一九五零年五月全省大逮捕，臺灣省鐵路管理局臺北各支部為循線破獲，政府再循線南下破獲鐵路新竹支部，一九五一年四月，政府利用被捕之鐵路新竹支部黨人林逢祥成功設局誘捕林希鵬。(張炎憲，2001: 3; 張炎憲、許明薰、陳鳳華，2001) 十一月二十五日，林希鵬與黎明華、劉興炎九人聯名公開向陳福星勸降，而由其誘捕的范新戊，則成為臥底線人，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林希鵬與黎明華、劉興炎等地下黨領導，宣言脫離中共而自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防部核准陳福星、曾永賢、劉興炎、林希鵬、黎明華、蕭道應等六人自新，林希鵬則經安排進入調查局服務，最初分派到桃園縣調查站，以後則調到臺南縣調查站擔任主任至退休，退休後從事汽車零件生產事業。(曾永賢，2009: 121) 林希鵬的革命人生和苗栗並無直接關係，他投身調查局後，為黨國效力，有刑虐被告之傳說云云。筆者認為那是昔日中華民國情治系統辦案的陋習，只是與曾為工農革命者的形象連結，令很多人難以接受。家父始終記得和相信，如果自新後這一生再遭遇來自國民黨國任何政治上的騷擾，林希鵬是最後的救命符。

具有臺灣大學學歷的苗栗左翼客家知識青年，還有羅吉月。羅吉月是苗栗銅羅人，臺大機械系肄業，一九四七年受留日返臺的家鄉前輩曾永賢啟蒙而左傾，在臺大期間，於一九四八年十月由林樹生介紹入黨，隸屬臺大工學院支部，在同為化學工程學系學生的書記王超倫和委員楊斌彥領導下，利用機械工程學會、學術理事會和臺大民謠歌劇團擴大地下黨在校園內的影響力，他從同系學會吸收有石玉峰和陳光仁，在民謠歌劇團裡則吸收有同系的傅煒亮、鄭熙炳、張燦生等人，而歸其領導。(曾建元、曾薰慧，2006: 120) 一九五零年五月全省大逮捕，羅吉月休學離校回鄉避難，而被捕的王超倫則未

供出羅吉月。羅吉月返回苗栗後，即追隨曾永賢加入省工委的重整工作，並以銅鑼為據點，發展出西湖鄉之九份支部與泰安鄉之興隆山支部，並不時接受在新竹市北門街開設興中書局的傅煒亮的接濟，傅煒亮三弟傅偉奇，係臺灣省立臺中農學院森林學系學生，則幾次將偷聽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通訊社廣播的內容，抄寫後交給羅吉月。（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學術部、『臺大意識報』，2012）當省工委勢力日蹙，陳福星、曾永賢等領導幹部相繼接受招安，羅吉月則仍為劉南輝之重要幹部，在山區艱苦逃亡，劉南輝受勸降後，於一九五三年三月與曾永賢於頭屋東三湖向謝裕發、羅吉月招降。羅吉月投降後獲准自新，而與曾永賢等進入調查局任職。

留學日本的，除了曾永賢，尚有陳紹英、蕭春進和黃昌祥等人。陳紹英是三灣客家人，少年時受廖天珠啓蒙，萌生客家意識和嚮往三民主義，立志出鄉關，到日本半工半讀，先後在大阪和東京完成中學教育，再於東京專修大學夜間專門部進修。太平洋戰爭期間受日本帝國徵召從軍，日本戰敗後復員，回到臺灣。陳紹英在日本自修群籍，他自云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河合榮治郎『社會政策原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周佛海的『三民主義解說』）對他影響深遠，他們各以人道主義、結合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和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精神來召喚著身為殖民地人民的少年陳紹英，使他誓願在戰後投入新臺灣的建設。他憑藉著對於民生主義節制資本的理念與熱情，積極奔走推動日產展南拓殖株式會社改制為由從業員與蔗農組成之糖業生產合作社，實現產業民主，為此而成立展南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工作推進委員會，推舉代理三灣鄉長廖上烜出任主任委員，同時亦與同鄉青年彭南華、張振興等人共同籌組三灣三民主義青年團，出任書記，從事三灣公共事務。一九四六年九月，展南拓殖株式會社由臺灣日產處理委員會新竹縣分會拍賣，參與投標的當地林為恭、新竹陳性、吳火獅，以及楊隆盛等三個集團聯合圍標，由三方共同設立之新臺灣經建物產公司繼承展南的經營，展南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工作推進委員會未能如願得標，糖業生產合作社運動乃告失敗，而其主委廖上烜卻反因參與圍標而得出任董事。二十一歲青年陳紹英的滿腔抱負，可說遭到一群政商利益共同體的聯合出賣。在此同時，三灣三青團則應三青團臺灣支團長

李友邦之指示，改組為社會服務隊。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期間，陳紹英等人為了團結新竹、苗栗一帶青年，而組成青年組織，關注事件演變，保持待命態勢。陳紹英擔心盲動招致災禍，曾經連夜趕路及時阻止前三青團幹部爆破縱貫鐵路造橋站附近鐵軌的計劃，但則未能阻止其接收農會倉庫幫助農民取回遭政府強制徵收之稻穀的行動。一九四九年五月，陳紹英協助張振興參選三灣鄉農會理事長成功而出任總務股長，十月初，婉拒鄉公所會計孫阿泉等人關於加入地下黨的邀請。月底，孫阿泉、彭南華、廖天珠等人因身分暴露而逃亡，陳紹英與其關係密切而受懷疑，於隔年四月被捕，以經孫阿泉介紹參與臺盟竹南支部為由而列名曾文章〈竹南案〉被告，為保安司令部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送至臺東縣綠島新生訓導處服刑，至一九六三年始獲釋。他是一九五三年國民黨政府在綠島和新店發動屠殺政治犯事件的倖存者，當時他因為不願屈服於國民黨，而在獄中消極抵抗，一度被新生訓導處移送臺灣本島新店安坑軍人監獄關押，和吳聲達、蔡炳紅等人同船，見證了這些被國民黨荒謬地指控「獄中叛亂」的年輕生命的最後階段。

陳紹英為人頗重感情，陳英泰一九九七年，在張瑞風等人的協助下，在他位於臺北市涼州街的大剛貿易有限公司串連政治受難者定期舉行便當會，討論與策劃平反運動，陳紹英就經常坐著火車從桃園上來臺北參加，他參與發起了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而後因主張平反和同情臺灣獨立，又投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立法。他就是在那一個時期，完成個人回憶錄『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日文初稿。(曾建元，2010) 陳紹英晚年每來臺北，有機會就找我見面，平日也會打電話跟我聊聊對於時局的看法，我才漸漸知道他經濟狀況不佳，為了在日本出版回憶錄和翻譯中文，可謂散盡一生最後積蓄，為了幫助他完成心願，也表達對那一代客家知識青年的敬意，我遂資助了『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中文版的出版。

陳紹英於二零一零年四月過世，時任臺大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的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邱榮舉教授帶領著博士班研究生黃玫瑄、碩士班研究生陳康宏和我等人，一肩挑起陳紹英紀念文集『硬頸的客家臺灣知識份子：陳紹英

(1925-2010)』的編輯出版工作，並由陳康宏爲他製作了生平的簡報檔在告別式上播放。邱榮舉的尊翁邱慶麟當年是中壢義民中學學生，曾受一九五二年〈義民中學案〉的株連，(邱榮舉、邱榮裕，2007) 他對於政治受難者家計維持的艱辛深有體會，更對勇於實踐政治理想的行動者敬佩和孺慕不已，因而懷抱著偉大的同情，協助家屬榮耀陳紹英的身後。

最後要談的是南庄鄉南富村(大南埔)的蕭春進和黃昌祥。南富位於中港溪南岸河谷平原，地勢平坦，因而爲南庄的穀倉，農業經濟相對發達，因而日治時代當地地主階級較有能力提供子弟升學的開支。田埔小組小組長蕭春進即留學日本學習獸醫，(許哲韡，2012: 12) 同組之黃昌祥亦留學日本，(許茵芸，2012: 9) 戰後返國，皆回到苗栗家鄉擔任國校教員，蕭春進在田美國校，黃昌祥在大河國校。一九四九年一月，蕭春進由孫阿泉吸收入黨，五月，黃昌祥則由游金龍吸收入黨，兩人皆爲大南埔人，另合南埔國校教員徐鼎房組成田埔小組。十月，蕭春進另發展出古滿興、鍾錦英及黃榮春，徐鼎房發展出溫德明。十二月，黃昌祥吸收引黃新玉。一九五一年六月，臺灣省情報委員會成立特種聯合小組，對大新竹地區之地下黨展開收網，當月九日，辭去教職，準備到崎頂牧場擔任專職獸醫的蕭春進夜半於家中被捕，(許哲韡，2012: 13) 緊接著田埔小組成員徐鼎房等人一一爲循線逮捕，一九五二年三月，蕭春進與黃昌祥等田埔小組成員同遭保安司令部槍決，黃昌祥遺體則遭棄置於臺北六張犁，一九九三年五月銅鑼支部徐慶蘭弟曾梅蘭尋獲徐慶蘭墓塚，方才一併發現。(曾建元，2011)

VI. 結語：白色恐怖的影響

1. 國民黨戰後在臺灣曾是佔領與殖民體制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分共後開始剿匪，這個「匪」是指中共及其所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長兼西北剿匪總司令蔣中正被副總司令張學良兵諫，國共方才有所謂第二次的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日戰爭結束後，國共爲了搶奪日本撤出後權力真空的佔領地，內戰又復起。

臺灣的情形則很特殊，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一方面在跟共產黨在重慶進行雙十會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雙方好像眉來眼去，要和平建國，但是在臺灣，共產黨的發展其實還是受到壓制的，因爲當時國民政府在臺灣其實是實施了特別的地方法制，對臺灣人來說，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看起來就像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總督府，而這個制度則的確和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所實施的省政府制度是不同的，事實上是一種佔領體制，行政長官掌握臺灣一切軍政大權，中央政府各部會駐臺灣各單位均受其節制，他僅對行政院負責。行政長官接收臺灣沒多久，就頒布了行政命令〈臺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解散了所有的民間社團，命令全部都應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申請同意與接受調查後始得重新登記，國共在互搶地盤，陳儀當然不會讓共產黨在臺灣登記成立支部，所以共產黨在臺灣只能走地下黨秘密組織的方式來發展黨務，否則會觸犯當時在臺灣所施行的特別法制而遭到取締。

中華民國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動員戡亂，這是國民黨清黨之後再一次跟中共翻臉，結果這回國軍兵敗如山倒，最後只能退守臺灣，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臺灣實施戒嚴，隨後臺灣的戒嚴，也被納入全中華民國範圍的戒嚴。

戒嚴原始的意義，是指軍事統治，換言之，在戒嚴地區，它的行政、立法、司法，全部由當地最高軍事指揮官所掌理，同時也排除了〈憲法〉中對人民權利的保障，雖然我們現在觀之，這個〈戒嚴法〉也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的必要性原則，只能採取傷害人民最小的方式來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但以前的人沒這個想法，直接就認爲，實施戒嚴非常法制，就可以把〈憲法〉的所有規定都把它排除掉，所以就不理〈憲法〉「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的規定，把臺灣所有的叛亂罪犯，一律送軍法審判。當年的軍事審判可和現今的軍事審判制度不一樣，現在的軍事審判至少還可以有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保障，讓當事人有上訴或辯護的機會，當年可是只有一審宣判就定讞了，完全排除了〈刑事訴訟法〉上有利於被告的一切原則與規定，這就是

爲什麼國民黨的黨國權力會如此地膨脹、權力如此濫用，而對人民的侵害這麼劇烈的原因。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新生訓導處第二任處長唐湯銘於一九九零年代接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訪時就說，判決有百分之六十是有問題的，（唐湯銘，1997：216）這是國民黨政府官員的含蓄說法。

2. 匪諜判決草菅人命

臺灣戒嚴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宣布的，但臺灣白色恐怖何以是在一九五零年代才展開的？關鍵因素在於一九五零年六月的韓戰爆發。韓戰爆發爲什麼跟白色恐怖的惡化有關係呢？因爲國民黨政權在臺灣因韓戰爆發而從此穩定了下來。美國爲了防堵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韓戰趁機攻占臺灣，所以就宣稱臺灣國際主權未定，派遣了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美國本來是要放棄中華民國，等內戰塵埃落定後，看看國民黨下場會怎麼樣再說，後來擔心共產主義勢力會迅速地往西太平洋擴散，心想情況不妙，所以改變了他們的對華政策，願意來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而這就使得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反而穩定了下來。原來是在風雨飄搖當中，但現在不一樣了，因爲美國伸手扶它一把，照理講，你的國家存續危機已經緩和下來了，所以對國內的鎮壓就沒有那麼必要，但不是這樣，韓戰之後白色恐怖反而惡化，因爲國民黨要關起門來打狗，趁機全力鞏固政權。

白色恐怖哪裡恐怖？政府隨便抓人、人民像雞籠裡的雞一樣，不知道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這種對生死的不確定感最恐怖。我舉〈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一個例子，大家便可知國民黨政府多惡劣。該條例第九條規定：“明知爲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就是知匪不報罪，執行的結果是匪諜的親友十族被株連；第十條第一項：“故意陷害誣告他人爲匪諜者，處以其所誣告各罪之刑。”因爲誣告匪諜罪不是誣告罪論處，而是匪諜罪、叛亂罪，其結果是檢舉人非把人告到底，否則很容易自己引火上身；第十四條：“沒收匪諜之財產，得提百分之三十作告檢舉人之獎金，百分之三十五作承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其餘解繳國庫。”此則誘使檢舉人與承辦人員爲了獎金而成爲結構性共犯，有

錢要分大家就得一起分，如果有人不參與，他就會害大家出事。再者，財力越厚的人，其人無罪，懷璧其罪，就越容易成爲被黨國鯊魚覬覦垂涎的肥肉，因爲檢舉獎金額度和被告的財產多寡直接相關。這個法訂得非常惡劣，制度性地變相鼓勵陷害和出賣，它的主要起草人，是當時年輕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副處長，德國法學博士李元簇，他也是〈懲治叛亂條例〉的起草人。（謝聰敏，2013）他自副總統卸任後，就選擇了在苗栗低調地終老。

國民黨政府把人抓起來後，不管是判感訓還是判自由刑，只要沒判死的，一律送綠島集中營。因爲是一審定讞，判死的常常馬上行刑，判決書都不一定給他或送到家屬，草菅人命到大體收屍沒通知到家屬，就把人隨便埋了，臺北市六張犁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公園裡的亂葬崗就是這樣來的，那些人可不是無名屍，苗栗銅鑼的徐慶蘭被處決後，他的哥哥曾梅蘭在將近半世紀後才在山裡找到，也才同時找到上百個當年失蹤的人和槍殺後不知去處的屍體。苗栗客家的曾文章、江應發、江添進、張增傳、黃昌祥、黃逢開、徐慶蘭、黃蘭芳、林彩滿、陳新錦、徐金生等人的墓穴，廖阿賜等人的骨灰，都在那裡，直到被發現前，孤魂野山，荒塚蔓草，無人問津。

政治犯一生都受〈戡亂時期預防匪諜與叛亂犯再犯管教辦法〉的禁錮，國家安全部門和警察會定期監控查處，一旦發現有二心異狀，可以不經審判再把人抓去勞動教育改造，情節嚴重者則再判罪，他的家人當然也都受到列管，誰也不願惹禍上身，於是國民黨政府便成功地性對政治犯建立起一道道社會孤立的圍牆，還好公道自在人心，我們的社會民主化自由化了，大家終於瞭解這些政治犯，大多數是無辜者或人格者，終於瞭解國民黨政府當年是怎麼樣把每一個國民都當成叛亂嫌疑犯在看待。

3. 消失的反對運動傳統

苗栗在中共地下黨的後期擁有這麼重要的戰略地位，前已言之，這跟苗栗的地理區位與歷史淵源有關。苗栗這地方是山區，所以我們這裡的經濟狀況不如平地面積比較多的縣份，地理因素對我們的地方產業經濟和人們的生活水準造成很大的影響。也是因爲地理區位的關係，所以在苗栗過去的歷史

發展當中，從日本時代開始，爲了爭取苗栗農民生活水準之提升、社會經濟地位的改善，就已經有了社會運動在這個地方風起雲湧。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爲什麼苗栗地方，自從一九五零年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還沒有出現過反對黨的縣長？苗栗的地方派系劉、黃派跟國民黨關係相當密切，衆所皆知，可是你想想，地下黨最後是在苗栗這個地方結束的，且苗栗從清朝、日本時代，都有長期的草根反抗運動傳統，那爲什麼在光復以後表現得這樣子？因爲國民黨政府實施了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項土地改革，讓苗栗這地方的多數貧農、佃農得以翻身，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得以重組，使得農民運動長久所努力和奮鬥的目標，在一夕之間得以和平完成，曾永賢在張炎憲館長主持的口述歷史『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中也坦承，三七五減租對他們發展地下組織造成很大的阻礙，因爲他們要幫農民翻身，三七五減租又用政府的力量在分田，那還要再幹什麼？三七五減租根本破壞了農民革命的社會條件。(曾永賢, 2009: 86-88) 苗栗這地方人民因爲政策受惠，加上閩客共處，使國民黨得以利用族群與派系矛盾，在國家權力和地方各勢力之間形成了恩庇侍從的關係，也就是用國家權力資源支持配合其維持統治秩序的地方政治平衡，然後是客家人的性格老實敦厚善良，就是他們會覺得說，既受惠於國民黨政府，拿人一斗，報人一世，也許最初的記憶已過去了，但因路徑依賴的關係，政治上的投票傾向從此就受到定型了，而苗栗地方政治市場也因而未再出現有實力的反對派。

4. 『苗栗縣志』史觀之檢視與臺灣紅色旅遊之發想

一九九八年六月〈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公布實施，中華民國承認戒嚴時期存在叛亂及匪諜案件之不當審判，並同意給予被害人及其家屬金錢補償和名譽之平反，爲塵封已久的戰後臺灣左翼歷史打開一善天窗。如果吾人同意人民通過締結社會契約組織國家的目的在保障其天賦的自由、平等與獨立，並促進其舒適、安全、和平的生活，且當國家違反該一社會契約，人民有權終止契約收回授權甚至實施抵抗權，(John

Locke, 1986: 59, 76, 153; 曾建元, 2005: 146-147) 則當年左翼政治反抗的本質, 並非單純顛覆中華民國國家政權, 而是爲了伸張天賦人權抵抗暴政, 是維護立憲主義基本價值和人性尊嚴的正義之戰。確認此一歷史定位後, 我們再來看涉身其中的具體個人行爲, 有的出於社會正義的信念, 有的出於政治投機, 有的怯弱而出賣, 有的無辜而受誣陷, 始能分別給予適切的評價。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苗栗縣長傅學鵬於縣政府成立重修苗栗縣志纂修委員會, 親任主任委員, 聘請陳運棟、黃鼎松出任正、副總編纂, 二零零三年, 苗栗縣議會通過〈地方志書纂修自治條例〉, 以爲『苗栗縣志』與各地方志書重修之依據,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完成『重修苗栗縣志』三十五卷四十五志,(傅學鵬, 2006; 周錦宏, 2006)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出版完畢。總編纂陳運棟定義方志爲: 「記載特定行政區域之時、空、人、物、事, 且具備多種功能的綜合性官修著作」,(陳運棟、鄭錦宏, 2007: 25) 故而『苗栗縣志』就是以苗栗縣爲範圍的官修百科全書。『重修苗栗縣志』立意恢宏, 宣示其主要課題爲「以臺灣爲舞臺, 突破政治、政權、族群的限制, 探討不同時代人們所留下的各種影響, 努力搜集各種史料, 呈現苗栗社會的複雜性和文化的多樣面貌」,(陳運棟、鄭錦宏, 2007: 26) 這一多元史觀乃擺脫了中國傳統以統治者立場爲中心的正統史觀, 從行政地理中人民的角度來呈現地方歷史, 可以歸功於臺灣民主化所帶來的影響。職是之故, 苗栗縣這一歷史舞臺上曾經發生的白色恐怖和紅色抵抗, 也是『重修苗栗縣志』所當探討的課題。

『重修苗栗縣志』卷十『自治志』第二篇第二、三章即專章處理二二八事變與白色恐怖, 官方志書正視該一歷史, 並指其係蔣介石政權爲鞏固在臺灣統治而以反共爲名實施之肅清工作, 數以萬計之臺灣民衆遭秘密逮捕,(何來美, 2005: 115) 敘述未文過飾非, 堪稱客觀, 值得肯定, 惟關於苗栗地方之白色恐怖事蹟, 因欠缺調查與研究, 政府檔案和口述歷史資料皆未援引, 以致語焉不詳。卷卅二『人物志』第二篇第六章第三節專節爲受難者立傳, 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則皆爲白色恐怖受難者, 其人分別爲黃蘭芳、李建章、黃逢開、徐金生、李阿春, 可惜多僅有生歿日之記載, 事蹟皆未予詳述,(陳運棟, 2006: 475-476) 自亦無從對傳主蓋棺論定。大體而言, 『重修苗栗縣志』之

處理偏重於白色恐怖之受難者一面，但對於紅色抵抗的歷史意義，則未予以正視和闡述。事實上，對於受到不幸迫害和誣陷而犧牲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我們固然不忍和同情憐憫，但對於那些為民主與人權起奮鬥抗爭的義士，我們更欠缺一份追懷與尊敬。

二零零九年三月，我國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來臺旅遊，我曾經想過，苗栗規劃地方觀光，其實也可以來搞一個具有臺灣特色的紅色旅遊。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對觀光的定義是：“離開日常生活居住地，前往其他地方從事休閒、商業、社交或其他目的相關活動的總稱”，觀光遊憩系統可區分為供給與需求兩大部門，供給部門包括吸引力、食宿購買及相關服務設施、交通、資訊行銷等四大部份；需求部門則泛指有意願、有能力旅遊的人。觀光客追求各種體驗與滿足感，通常這會影響其對觀光目的地的選擇與對觀光活動之喜好；對於觀光事業來說，只要能針對觀光市場的需要，提供商品與勞務，就有獲利機會；對地方政府而言，觀光能為地方帶來經濟利益與繁華，對接待社區而言，觀光可為當地居民增加所得，並直接或間接增加稅收。(黃國敏、徐耀昌，2011：61-62) 苗栗縣的觀光主題係以「世界客家文化觀光旅遊地」為號召，融合豐富的休閒農業資源與客家文化，營造自身成為「生活台灣客家生活」的體驗地區，而在地方政府和觀光學者有關苗栗觀光旅遊的規劃和思考中，(黃國敏、徐耀昌，2011：67-71) 我們發現，展現客家硬頸精神的苗栗開拓史與反抗史素材，竟完全不在其視野之中。

二零零四年八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遊局啟動紅色旅遊工程，十一月該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出臺〈“紅色旅遊”景區建設規劃〉和『2004-2010年全國紅色旅遊發展規劃綱要』，並對「紅色旅遊」進行了如下的界定：是指以革命紀念地、紀念物及其所承載的革命精神為吸引物，組織接待旅遊者進行參觀遊覽，學習革命歷史知識、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和振奮精神、放鬆身心、增加閱歷的旅遊活動。(余鳳龍、陸林，2005：56) 除開教條式的套話，紅色旅遊其實就是一種以近代左翼革命歷史故事與史蹟為主題的體驗性觀光旅遊活動，其特色就在於故事性。中國大陸因為共產黨一黨領導，共產黨歷史遭到神化，所以各地遍布著以共產黨史蹟為中心規劃的紅色旅遊景點，

然兩岸人民則絕難想像，夙以反共著稱的臺灣，居然也曾經有過國際共產主義影響下的共產黨活動遺跡，但民主臺灣對共產黨的歷史詮釋，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了塑造人民對共產黨黨國愛國主義意識而以共產黨政治人物爲中心的開國神話觀點應當有所不同，我們應將之回歸到立基於自然法哲學和人本主義的社會契約論，從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和憲政民主的角度來加以看待，並以此作爲今後全體臺灣人民和統治者的警惕。這種對待紅色歷史的另類觀點，與兩岸官方的正統觀點迥異，其間所形成的強烈反差，正是苗栗客家左翼歷史主題的文化觀光旅遊引人入勝的地方。中國大陸紅色旅遊存在著區域經濟基礎、旅遊基礎設施、可進入性、管理體制及景區知名度等多重因素制約，這些因素的差異導致各地紅色旅遊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余鳳龍、陸林，2005: 57)但苗栗的臺灣紅色旅遊完全不存在上該問題，因爲不是觀光旅遊資源的全新開發投資，更不會損傷原有的旅遊條件，它是在既有已完整而成熟的旅遊資源基礎上，再加入歷史人文的新元素，提供另一種觀光旅遊的體驗，滿足對於臺灣近代史有興趣的特定客群的需求。『重修苗栗縣志』對昔日地下黨基地或遺跡無一著墨，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對此一問題亦毫無思考、調查與規畫。這是苗栗豐富的歷史文化與觀光資產，我們呼籲政府應予重視。

按照鍾浩東等人的想法，苗栗是發展游擊基地最好的地方，而事實上，這裡也的確是中共地下黨的最後根據地。我的想法是，苗栗紅色旅遊應當至少包括南庄的獅頭山、三灣的大河底、神桌山、永和山、三義的魚籐坪、大湖老街以及政治受難者胡海基(徐鑾枝弟)在頭屋鄉象山村自行捐資興建的民主英烈紀念公園等歷史性觀光景點，同時可以搭配推廣地方特產與美食，以幫助農業發展，也可以延伸納入臺北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那是苗栗白色恐怖受難者最多的去處。之於這一切，重要歷史地標的清點自然是第一步的工作。我認爲紅色旅遊可能不會比通霄馬家庄的馬英九奮鬥館(族群融合館)還沒有賣點，因爲話題新鮮，也更有警世意義，提醒人民要爲自由權利而鬥爭，也可以讓中國大陸觀光客和官員們知道過去會有多少共產黨人如何地堅持他們的理想，今天的共產黨在中國則如何成爲壓迫人民的異化的黨國統治機器。而當年曾經殘酷鎮壓兩岸人民與異議者的

中華民國，如今則在臺灣被歷史馴化為民主的國家。

<參考文獻>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陳新錦之墓」，『歷史迷霧與生死地景』，『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III，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臺北：中央研究院。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a，「黃逢開之墓」，『歷史迷霧與生死地景』，『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III，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臺北：中央研究院。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b，「林彩滿之墓」，『歷史迷霧與生死地景』，『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III，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臺北：中央研究院。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c，「徐金生之墓」，『歷史迷霧與生死地景』，『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III，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臺北：中央研究院。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一卷(1921-1949)』，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
- 王漢威，2011，『戰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1946-1950)』，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一百年一月。
- 王曉波，1997，「民族正氣蔣渭水」，『臺灣抗日五十年』，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七年七月。
- 王曉波，1997a，「永為臺民紀念的羅福星」，『臺灣抗日五十年』，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七年七月。
- 史明，1980，『臺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蓬島文化公司，一九八零年九月。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 何池，2008，『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臺灣革命研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二零零八年四月。
- 何來美，1997，『劉黃演義：苗栗近代史話』，臺北：臺灣書局，一九九七年十月。
- 何來美，2005，『重修苗栗縣志，卷十 自治志』，苗栗：苗栗縣政府，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 何來美，2009，「縱覽三義之拾：三義重大事件簿」，徐永欣總編纂，『三義鄉志』，下冊，三義：苗栗縣三義鄉公所，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
- 何來美，2012，「白色恐怖受難者，境遇大不同」，臺北：『蘋果日報』，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
- 余鳳龍、陸林，2005，「紅色旅遊開發的問題診斷及對策—兼論井崗山紅色旅遊開發的啓示」，『旅遊學刊』，第二十卷二零零五年第四期，北京：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學院。
- 邱榮裕，2010，「客籍羅福星(1886-1914)在臺之革命事件報導」，『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

- 院電子報》，第一百一十二期，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 邱榮學、邱榮裕，2007，「臺灣客家與義民中學政治案件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計畫，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 邱榮學、謝欣如，2007，「戰後臺灣客家政治菁英與白色恐怖政治事件—解析許信良與三個重要政治事件之關係」，第二屆『臺灣民主的興起與變遷』學術研討會，霧峰：臺灣省諮議會，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 林天乙主編，1999，『中共閩粵贛邊區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
- 林必修，2012，「我永遠のお姉さん(姊姊)—訪張燕梅老師之弟張燕賢」，『臺大意識報』，第四十九期，臺北，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卓揚、丘維英、鄧慧，1982，「東區服務隊與丘琮」，『廣州文史資料』，第二十七輯，廣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廣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
- 周錦宏，2006，「重修苗栗縣志序四」，陳運棟總編纂，『重修苗栗縣志』，各卷卷首，苗栗：苗栗縣政府，民國九十五年三月。
- 李宣鋒主編，1998，『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三)—個案資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一日。
- 李喬，2001，『寒夜三部曲—荒村』，臺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二零零一年七月。
- 侯坤宏，2007，「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期刊』，第十二期，新店：國史館，二零零七年六月。
- 唐湯銘口述，1997，李宣鋒訪問，「唐湯銘先生訪談紀錄」，李宣鋒、王加俊、鄧小蘭、許秀錢、王韻雯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附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一日。
- 程玉鳳，2002，「台糖總經理沈鎮南叛亂案的平反」，『析世鑒』，紐約：『博訊』博客，二零零二年。
- 曾永賢口述，2009，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新店：國史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 曾培強，2010，『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案件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二零一零年七月。
- 曾建元，2005，「論憲政主義及其價值優先順序」，『元培學報』，第十二期，新竹：元培科技大學，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 曾建元，2008，「曾群芳(1927.11.27)—二二八人物小傳」，臺北：『今日新聞網』，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
- 曾建元，2008a，「二二八人物小傳—鄭文峰/1929.1—1950.11」，『極光電子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臺北：臺灣教授協會、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
- 曾建元，2010，〈他，走進了歷史—永遠的客家青年陳紹英(1925.2—2010.4)〉，紐約：『大紀元新聞網』，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
- 曾建元，2010a，「黃院士的中共論述與最新現—中國共產黨與臺灣二二八事變」，朱滋源主編，『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視角：黃彰健院士追思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曾建元，2011，「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的歷史意義」，『縱覽中國』網，普林斯頓：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四日。
- 曾建元、曾薰慧，2006，「青春戰鬥曲—戰後國立臺灣大學政治事件之研究」(下)，『當

- 代』, 第二百三十一期, 臺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
- 張炎憲, 2001, 「風中的哭泣 -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 『竹塹文獻雜誌』, 第二十期, 新竹: 新竹市政府, 二零零一年七月。
- 張炎憲、許明薰、陳鳳華, 2001, 「新農會案 - 鍾阿千訪問紀錄」, 『竹塹文獻雜誌』, 第二十期, 新竹: 新竹市政府, 二零零一年七月。
-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學術部、『臺大意識報』, 2012, 『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 - 臺大1950年代檔案及影像展』,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學術部、『臺大意識報』,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Facebook貼文。
- 國防部保密局, 2008, 「桃園縣地方概況及匪諜案件較多原因」, 許進發編,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簡吉案史料彙編』, 新店: 國史館、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零零八年五月。
- 國家安全局, 1961, 「匪『臺灣省工委會竹南支部』殘匪翁木等叛亂案」,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第三輯, 臺北: 國家安全局, 民國五十年。
- 國家安全局, 1991, 「匪新竹地區竹南區委員會李建章等叛亂案」, 『安全局機密文件,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上冊, 臺北: 李敖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 國家安全局, 1991a, 「匪苗栗油廠支部彭新貴等叛亂案」, 『安全局機密文件,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上冊, 臺北: 李敖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 國家安全局, 1991b, 「策反臺共苗栗殘匪武裝組織劉雲輝等案」, 『安全局機密文件,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下冊, 臺北: 李敖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 國家安全局, 1998,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人案」, 李宣鋒、王加俊、鄧小蘭、許秀錢、王韻雯主編, 『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三) - 個案資料』,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一日。
- 楊渡, 2009, 『簡吉 - 臺灣農民運動史詩』, 臺北: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一月。
- 陳君愷, 2006, 『狂瀾的年代 - 1920年代臺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 臺北: 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二零零六年十月。
- 陳芳明, 2009, 『謝雪紅評傳』, 臺北: 麥田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三月一日。
- 陳映真, 2001,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 『鈴璫花』, 臺北: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十月。
- 陳紹英, 2005, 『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 臺北: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五年六月。
- 陳運棟, 2006, 『重修苗栗縣志, 卷卅二 人物志』, 上, 苗栗: 苗栗縣政府,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
- 陳運棟、鄭錦宏, 2007, 『重修苗栗縣志, 卷末』, 苗栗: 苗栗縣政府,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 陳建傑, 2011, 『戰後臺灣客家政治案件之研究 - 胡海基案之個案分析』(口試本), 臺中: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民國一百年六月三十日。
- 陳興唐主編, 1992, 『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 上卷, 臺北: 人間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 陳滢, 2012, 「一段讓人想不清的時代 - 專訪受難者范阿全」, 『臺大意識報』, 第四十九

- 期, 臺北,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許世楷, 2006, 李明峻譯,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臺北: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六年一月。
- 許哲韜, 2012, 「1951-2012小鎮青年後設敘事—訪蕭春進老師之子蕭正傳」, 『臺大意識報』, 第四十九期, 臺北,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許函芸, 2012, 「父後半生—訪黃昌祥老師之子黃德德」, 『臺大意識報』, 第四十九期, 臺北,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許進發, 2008, 「人間交叉線上的理想社會主義者」, 許進發編,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學生工作委員會案史料彙編』, 新店: 國史館、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零零八年五月。
- 黃玉坤口述, 2006, 沈懷玉訪問, 曹如君紀錄, 「黃玉坤先生訪問紀錄」, 『析世鑒—台澎重光與國府在莒』, 『博訊新聞網』, 紐約。
- 黃昭堂, 2006, 廖為智譯, 『臺灣民主國研究』, 臺北: 前衛出版社, 二零零六年一月。
- 黃國敏、徐耀昌, 2011, 「苗栗縣觀光產業發展的策略規劃」, 『中華行政學報』, 第九期, 新竹: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一日。
- 黃華昌, 1950, 「黃華昌在國防部保密局之訊問筆錄」(39.7.2), 許進發編,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學生工作委員會案史料彙編』, 新店: 國史館、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零零八年五月。
- 黃華昌, 2004, 蔡焜霖、吳水燈、盧兆麟、陳英泰、王春長、陳孟和、王文清譯, 『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 臺北: 前衛出版社, 二零零四年六月。
- 郭德宏編, 2007, 『彭湃年譜』,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二零零七年九月。
- 傅學鵬, 2006, 「重修苗栗縣志序二」, 陳連棟總編纂, 『重修苗栗縣志』, 各卷卷首, 苗栗: 苗栗縣政府,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
- 薛雲峰, 2008, 『快讀臺灣客家』, 臺北: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三月。
- 藍博洲, 1991, 『幌馬車之歌』,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
- 藍博洲, 2003, 「折翼的黨人—黎明華(1923-1997)」, 『紅色客家人—一九四零、五零年代臺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 臺中: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 藍博洲, 2003a, 「竹南區委書記—劉雲輝(1920-)」, 『紅色客家人—一九四零、五零年代臺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 臺中: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 藍博洲, 2003b, 「革命不是街上人搞的—張南輝(1927-)」, 『紅色客家人—一九四零、五零年代臺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 臺中: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 藍博洲, 2003c, 「山大王—羅坤春(1924-2002)」, 『紅色客家人—一九四零、五零年代臺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 臺中: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 藍博洲, 2003d, 「無悔的道路—謝其淡(1927-1994)」, 『紅色客家人—一九四零、五零年代臺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 臺中: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 藍博洲, 2003e, 「一個悲劇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1916-2002)」, 『紅色客家人—一九四零、五零年代臺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 臺中: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 藍博洲, 2004, 「大河底的政治風暴」, 『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 中和: INK

-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 藍博洲, 2004a, 「滿腔熱血付東流—宋松財的證言」, 『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 中和: 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 羅福星, 1977, 「羅福星之自白書」, 莊金德、賀嗣章編譯, 『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 臺中: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日。
- 臺灣總督府, 2006, 王乃信、王康叟、林至潔、林獻香、周再添、許江漢、黃玉坤、蘇必凱、鄭溪北譯,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一九三六)』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 臺北: 海峽學術出版社, 二零零六年六月。
- 臺灣總督府, 2006a, 王乃信、王康叟、林至潔、林獻香、周再添、許江漢、黃玉坤、蘇必凱、鄭溪北譯,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一九三六)』第四冊—無政府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 臺北: 海峽學術出版社, 二零零六年六月。
- 謝孟達, 2012, 『生死之間: 戒嚴時期政治案件死刑判決之研究』, 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二零一二年九月。
- 謝雪紅口述, 1997, 楊克煌筆錄, 『我的半生記』, 臺北: 楊翠華,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 謝聰敏, 2013, 「白色恐怖籲天錄序」, 紐約: 『臺灣海外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
- Locke, John(約翰·洛克), 1986, 葉啓芳、瞿菊農譯, 『政府論次講』, 臺北: 唐山出版社, 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 Snow, Edgar, 1948,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now, Edgar(埃德加·斯諾), 2002, 上海復社、亦愚、董鼎山譯, 高志佳策劃, 『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 臺北: 一橋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九月。

(한글요약)

『묘률현지(苗栗縣志)』 사관(史觀)의 재건과 지방 역사 문화관광 자원의 발굴

-묘률현(苗栗縣) 객가(客家)와 국제공산주의운동을 중심으로-

정 지앤위안 (曾建元)

묘률현(苗栗縣)은 대만(臺灣) 서부 해안 중북부에 위치하고 있고, 구릉과 산악이 이어져 한인(漢人)이 서부 해안에서 마지막으로 개간하여 현을 세운 곳이다. 해안지역에는 주로 복로족(福佬族)이 분포하고 산지는 태아족(泰雅族)의 전통적 영역이며, 이곳에서 인구가 가장 많은 객가인들은 산과 바다 사이의 구릉과 분지에 분포하였다.

이 지역 객가 이주민들 다수는 가족집단과 군사를 거느리고 이주 개간하였기에 기풍상 상무(尙武)와 단결을 중시하여 대만민주국(臺灣民主國)의 항일운동기에 이 지역 신묘군(新苗軍)은 대만의용군의 주력을 이루었다. 제1차세계대전후 소련이 국제공산주의운동을 주도하면서 농민운동은 동아운동(東亞運動) 발전의 절정을 이루었고, 중국국민혁명과 대만 문화계몽운동 채택은 모두 거기서 자극 받은 것으로, 농민운동과 공산주의운동은 묘률에서 싹이 터서 태평양전쟁전 대만농민조합과 대만공산당 영화산(永和山) 무장기구의 선구를 이루었고, 대전후에는 역사적 지리적 요소에 기인하여 중국 공산당 지하당의 대만에서의 최후 근거지를 이루었다.

중국국민당의 반공의식의 형태와 백색공포 통치로 말미암아 묘률 객가인들의 좌익반항운동은 대만과 묘률의 역사적 기억에서 거의 사라졌다. 그러나 대만의 민주화와 양안 교류의 확대에 따라 이러한 과거

에 대한 회고의 경향이 일어나면서 그 희생자들에 대해 정당한 역사적 평가를 하여 그들의 혼이라도 고향으로 돌아와 영원히 묘를인의 마음 속에 살아 있게 하려는 시도가 전개되고 있다.

그런데, 고사(故事)를 통한 마케팅에서 묘를의 좌익 사적과 관광과의 결합을 시킨 것은 묘를의 역사 자료를 지방 공동의 역사 기억과 문화 관광 자산으로 발전시켰다. 즉, 상업적 동기로 향토 공동체 의식을 강화한 한편 고사 마케팅을 이용하여 지방 관광을 활성화시킨다는 것이다. 이것은 좌익 담론과 역사적 관점을 숙지하고 있는 중국 대륙의 관광객들에 대해서는 더욱 흡인력을 가질 것이다.

주제어: 대만객가, 묘를현, 공산주의, 농민운동, 백색공포, 관광

關鍵詞: 臺灣客家, 苗栗縣, 共產主義, 農民運動, 白色恐怖, 觀光

Keywords: Taiwan Hakka, Miaoli County, Communism, Peasant movement, the White Terror, sightseeing

(원고접수: 2012년 11월 30일, 심사완료 및 심사결과 통보: 2013년 2월 12일, 수정 원고 접수: 2월 18일, 게재 확정: 2월 25일)